

製作新文類：

晚清報刊的社會調查

連 玲 玲^{*}、葉 韋 君^{**}

摘 要

本文梳理社會調查文類於晚清報刊出現的歷史，探討「調查」如何作為「新文類」出現於留日學生的同人刊物上，為興利除弊，追求準確、實用性的工具。此文類的出現，不僅表述為一種新的知識形式、溝通方式、也是社會行動，包括訂定規範、組織調查會、設置專欄，以實證、表列、數字的文本型態，廣邀民眾參與、發布。

《浙江潮》、《江蘇》、《雲南》等三份刊物發行於1903-1907年，是較早發布調查公約，並具有規模的期刊。作為調查報導的濫觴，它們為調查建立較明確的定義，卻屢在實際收稿與編輯時遭遇困難，表現在專欄界定上的游移不定，與新聞、訪函、雜文的區別模糊，也正是在此摸索過程，研究者可見「新文類」碰撞、試錯的具體社會實踐。

本文借助數位研究工具，運用共現詞網絡的機器分群，協助找出調查報導主題，並輔以人工詞彙分類，解讀文本類型內涵。此外，我們透過分詞技術，找出日語借詞（新詞），進一步解讀新詞在新文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類上的應用情形。在單篇文章平均超過三成的使用基礎上，我們可推論，新詞在新文類的製作過程中，功不可沒。此外，我們在新養分內尋找到舊資源，包括表列、繪圖及敘事方式，都有傳統地方志的痕跡，由此，新舊嫁接的調查文類才得以成形，並逐漸為人所接受、流傳。

關鍵詞：社會調查、留日學生、數位人文、共現詞網絡、文本探勘

The Production of New Literary Categories:

Social Surveys within Late Qing Dynasty Periodicals

Ling-ling Lien^{*}, Wei-jun Yeh^{**}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and contexts surrounding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urveys within periodica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imarily discussing how surveys as a “new literary category” operated as a device from which to pursue accuracy and practicality while dismantling what was considered harmful or backwards in the publications of students abroad in Japa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enre not only expressed new forms of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but was also a social act, namely prescribing norms, organizing societies revolving around surveys, creating specialized columns within publications, and invi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Zhejiang chao 《浙江潮》, *Jiangsu* 《江蘇》, and *Yunnan* 《雲南》, all issued around 1903-1907, were the earliest periodicals to publish survey conventions of any kind. Being the forebearers of survey reporting, these publication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lear definitions of the new category. The receiving and editing of related articles, however, were rife with difficulties,

^{*}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urvey writings, news reports, letters, and opinion pieces were ambiguous, demonstrating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columns. But it is precisely within this process that we can observe the collisions of new literary categories and the trial and error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crete social practices.

This paper employs digital research tools to identify shared themes across survey reports by using machine clustering of co-occurrence networks, themes which are supplemented by lexical classifications performed manually to decipher the connotations of textual forms. We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new” and “old” are far from diametric in these processes. The tables, figures, and narrative styles, all of which contain traces of traditional local gazetteers, used by social surveys grafted new and old together to form a new category of survey, one which was gradually accepted and circulated.

Keywords: social surveys, students abroad in Japan, digital humanities, co-occurrence networks, text mining

製作新文類：

晚清報刊的社會調查^{*}

連 玲 玲、葉 韋 君

一、前言

1913年，服務於北京青年會的美國傳教士步濟時（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鑒於青年學生對於社會問題與社會服務感到興趣，便組織北京社會實進會，並號召學員投入社會調查。¹第一個項目便是調查302個人力車夫的生活情形，特別設計問卷，針對年齡、婚姻狀況、生活收支、工作條件等進行研究，最後由陶孟和（1887-1960）以中、英文寫成調查報告。²這項計畫引起相當大的迴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民國時期大眾期刊的社會調查：一個數位人文的探索」（108-2410-H-001-013-MY2）的部分成果。撰寫期間，陳建守教授慷慨分享建置中資料庫的數據，近史所數位資料庫助理林明宜小姐、陳建安先生協助資料處理。初稿曾分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22年1月20日）和法國Aix-Marseille University（視訊，2022年4月7日）報告，承蒙邱偉雲、陳建守、黃克武、孫慧敏、Christian Henriot、Cécile Armand等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¹ 步濟時：〈「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期第4版（1919年11月1日）。

² 陶孟和：〈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收於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卷2，頁101-121。

響，李景漢（1895-1986）譽之為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開端，³這也影響到後來社會學家的看法：多數社會學史的著作都把步濟時的人力車夫計畫視為中國社會調查的先驅。⁴

近年來學者開始把中國社會調查出現的時間往前推移到晚清，雖然對於起始點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人認為是1903年留日學生的鼓吹，尤其是東京的浙江、江蘇、湖北同鄉會為了改革中國而積極推動的原鄉調查，被視為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的嚆矢。⁵也有人把時間提至1897年，主張《農學報》所刊登的〈瀏陽土產表〉是中國第一份具有近代意義的社會調查報告。還有人認為，1871年任職於海關的醫務官黃寬（1829-1878）所作的廣東流行病調查，是中國出現較早符合近代學術規範的調查成果。⁶儘管大家對誰爭得「第一」的頭銜意見不一，但都質疑「中國社會調查始於民國」的既定成說。

這個爭論可以說是學科之爭。社會學家支持社會調查源於民國，視之為研究社會的科學方法，甚至認為這是使社會學從抽象的哲學思辨轉變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的基礎。⁷同時他們也認為這是一項專門學問，應當由受過特定訓練的人來操作——李景漢就曾經批評，儘管1920年代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蓬勃一時，不少個人和團體參與，但其中失敗的占大多數，「這是因為熱心這項工作的人雖然很多，可是真有調查智識的人極少，至於受過調查訓練而又有充分的經驗的人更

³ 李景漢：〈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第1期（1927年6月），頁80。

⁴ 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9。

⁵ 孫濤：〈中國早期留日學生的社會調查實踐〉，《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2004年8月），頁29-32。牟永如、許小青：〈社會調查真開始於民國嗎？——以清末社會調查為中心探討〉，《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2008年4月），頁93-96。

⁶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1年），頁76。

⁷ 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頁19-20。

少。」⁸顯然他心目中的社會調查必須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來執行。1914年北京人力車夫調查的主事者步濟時，1905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之後，曾到日本京都一所商業學校教授英文，1907年回美進修，1909年自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中國。⁹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紐約唐人街粵商特質之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即是社會學的調查訪談¹⁰——這為他後來的研究奠下基礎。1922年燕京大學成立社會學系，步濟時擔任第一任系主任；他在中國所從事的第一項調查項目也就成為社會學界所津津樂道的「肇始」。該計畫結案報告的執筆人陶孟和更是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的代表人物，1910年曾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修習經濟學和社會學，1913年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學院，翌年轉任北京大學，並負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該部後來獨立為社會調查所，1934年併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由陶孟和擔任所長。從步濟時和陶孟和的學經歷可以看出，1914年的人力車夫計畫乃由社會學界所主導的專業研究，而後世社會學者視之為中國社會調查的開端，不無為社會調查專業性辯護的意味。

主張社會調查源於晚清的學者多為歷史學家，他們從期刊編輯的社會實踐層面來看社會調查的出現。例如李章鵬從上海圖書館編纂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發現，1900年以前已出現了關於調查信息的期刊文章，到了1903年更有5份期刊設有調查專欄。這類研究的重點在於為調查定出時間點，或為調查文本分類，但較少針對調查內容

⁸ 李景漢：〈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頁96。

⁹ “Memorial page for John Stewart Burgess (12 Jul 1883-16 Aug 1949),” Find a Grave, accessed May 26, 2021, www.findagrave.com/memorial/100284501/john-stewart-burgess, Find a Grave Memorial ID 100284501, citing Oak Park Cemetery, Claremont, Los Angeles County, California, USA; Maintained by Susan Kimes Burgess (contributor 47528859).

¹⁰ John Stewart Burgess, “A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in Chinatown, New York, as Shown by Their Use of Leisure Time,” (M. 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09).

進行更深刻的定性分析。有趣的是，儘管李章鵬並非對於黃寬的流行病調查一無所知，事實上他最近出版的專書也肯定其研究價值，不過他認為「這畢竟是為外國人所作，而且它們對後來中國社會調查潮流的興起也幾乎沒有什麼影響。」¹¹換言之，他所認為的「現代社會調查」，判準關鍵不僅是新知識技術的傳播與應用，更在於民族主義的維護。不論是否同意李章鵬的判斷標準，他的主張間接提醒我們，調查並非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知識類型，而是需要從它的出現脈絡和書寫形式來加以界定的文本，或者說，調查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文化現象。

本文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出發，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理解社會調查，特別著重於調查如何形成一種傳達知識的新形式。李良榮研究近代報刊時指出，晚清報刊上的調查報告往往是新聞、歷史和政論的混合體，「吸收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和外來文體的長處，便於新聞工作者更深刻、更全面、更具體、更靈活地反映現實。」¹²這個說法突顯了調查的複雜性：它不但是一種收集訊息的工具，也是呈現訊息的形式，藉由分析調查報告的書寫，我們可以更具體地了解知識的生產過程。本文把調查視為一種「文類」（genre），乃基於文類研究的新見解：傳統乃從「功能」的角度來定義文類，或者說，功能決定了文學形式，¹³例如傳統文學研究把文學作品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文類。1980年代起，語言學家開始注意文類的語言特徵，尤其是重複出現的語言規則對文類形成的影響；¹⁴修辭學者則從

¹¹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頁73。

¹² 李良榮：《中國報紙文體發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5。

¹³ Janet Giltrow and Dieter Stein, "Genres in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Genre Theory," in *Genres in the Internet: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Genre*, eds. Janet Giltrow and Dieter Stei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2.

¹⁴ Douglas Biber,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0-71.

「溝通」的角度重新定義文類，特別關注修辭類型出現的社會情境，並將文類的生產視為一種「社會行動」。¹⁵晚清知識分子為了鼓吹社會調查，不但組織調查會，還在報刊上設置專欄，並訂定寫作規範，儼然希望創造一種表述新知識的溝通形式——從這個角度看，晚清社會調查運動也可以視為製作新文類的努力，本文即從社會行動和文本分析的視角出發，探討社會調查這種文類的形塑與運作。

二、晚清的社會調查運動

儘管早在19世紀中葉已出現具現代意義的社會調查，1872年《申報》也已出現「調查」一詞，¹⁶但調查成為一種有組織、有目的之社會行動，則要到19、20世紀之交，由東京的留日學生發起：他們眼見日本傾國家之力，進行大規模調查，據以為社會改革的基礎，故紛紛倡議組織調查會，了解本國各地風俗民情，進而提出社會問題的解方。留日學生的調查活動有兩種組織方式，一以地域為基礎，二以專業領域為主題。清末留日學生的派遣配額乃以省為單位，各省均設監督管理；而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宏文學院依學生原籍編班，設有南京普通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師範班、北京警務班等。¹⁷有些省份還成立同鄉會，出版同人刊物。根據黃福慶的統計，1898至1911年間，東京有15份以中國地域為名的期刊。¹⁸同鄉會刊物的宗旨除了介紹新知、激發愛國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增進對原鄉的認識

¹⁵ Carolyn R. Miller, "Genre as Social A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0, no. 2 (May 1984): 151-167.

¹⁶ 〈八月十二日京報全錄〉，《申報》第4版，1872年10月1日。

¹⁷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29。

¹⁸ 這些期刊包括《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雲南》、《洞庭波》、《河南》、《四川》、《晉聲》、《晉乘》、《秦隴報》、《粵西》、《關隴》、《滇語報》、《廣西》、《江西》。參閱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132-135。

及文化認同。為達此目的，不少刊物設置調查欄目，披露原鄉的社會實況。

1903年成立的湖北、浙江、江蘇同鄉會，均下設調查部門，可說是晚清調查運動的先驅，其中又以後兩者規劃較為縝密，不但起草公約敘例，明訂調查員的權利義務，也制定調查報告的書寫範例。首先，兩者皆言明「凡屬本同鄉會會員皆有擔任調查之責」，固然是為省卻招募調查員的麻煩，這也意味著調查是同鄉會的核心任務。為有效推動業務，乃設部長（總幹事）一人，經理全部調查事宜，書記一人，管理調查部書信稿冊，調查幹事每府各一人，竭力設法託人擔任調查事務；以上各員皆由同鄉會員公舉。¹⁹

值得注意的是，同鄉會所欲動員的調查人力，並非僅限於留日學生，還包括在鄉的父兄戚友，這不單緣於留學生遠在異國，無法自舉調查之職，也因為從一開始，同鄉會所設定的最高目標是「一省之中，雖人人無調查之職任，然人人盡調查之義務」。為了鼓勵會員進行調查，甚至允諾「俟同鄉會經費充足，力能請人旅行探險實地調查，屆時自當議給公費。」²⁰由於這些同鄉會刊物發行時間不長，提供公費進行調查的理想無法實現，但從種種規畫可以看出留日學生對於社會調查的企圖心。

浙江和江蘇同鄉會為留日學生推動原鄉調查立下典範，其他省籍的留日學生也紛紛跟進。1906年創刊的《雲南》便設置各種名目的調查員，如通信員、視查員、訪事員、特派員等，且其駐在地不限於東京和雲南，還包括北京、越南、緬甸。1908年創刊的《江西》定出規約，把調查員分特別訪員和通常訪員兩種，前者由該社物色邀請，每

¹⁹ 浙江和江蘇同鄉會調查部的規章、組織及職稱十分類似，惟總理調查事務者，江蘇稱之為部長，浙江稱之為總幹事。〈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1903年4月27日），頁1-3；〈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無頁碼。

²⁰ 〈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江蘇同鄉會也有類似的承諾，見〈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頁2。

月至少供稿兩篇，無法執行任務時，需託人代理，不得中途曠職，若要辭去職務，需兩個月前函告。後者則是自願投稿人。兩種來稿均由編輯部擇優刊登，稱勞報酬。訪員與雜誌社並非僱傭關係，並不支領薪水，但特別訪員享有社員的同等權利，可參與社內活動，通常訪員視其訪函多寡，贈送本誌若干。²¹《四川》則發出呼籲：「仰懇我四川十二府八直隸州六直隸廳一百二十餘州縣之憂時志士、愛國名流，自任為本報訪事員，就其身所見聞，各揮如椽巨筆，將政界學界軍界商界及同胞一切顛連困苦情形，和盤托出，公諸本誌。」²²

除了同鄉會之外，專門學校學生也發起社會調查，例如留日陸軍學校學生成立武學編譯所，並於1908年5月發行《武學》雜誌，創刊號設有「調查」一門，刊登國內外軍事相關調查內容，如〈中國軍艦之調查〉、〈日本海軍之調查〉、〈廣東派員測勘沿海港灣〉等。法政科學生也組成「法政學交通社」，以「研究法政、交換智識、提供社會為宗旨」，並發行月刊。依據該社章程，「本社社員散處各地，凡風俗習慣有與法政相關連者，各以其調查心得，互相報告，登入雜誌，以交換智識，並以備議法者之採擇，為修正法律之補助。」該雜誌並設有「工商業調查記」一科，²³不過實際上該刊的排版並未採取「專欄」形式，而與調查相關的論文也只有〈調查德國盲啞學校報告書〉、〈調查德國學事狀況報告表〉等篇。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學生則成立「中國醫藥學會」，以「輸入新理研究實學，以謀我國醫界之改革，藥學之進步」為職志。該學會下設學術及交通兩部，前者負責發行機關刊物《醫藥學報》，並召開會議演說學理，後者分為「通信機關部」及「實地調查部」，聯絡國內外通信員，推動國內醫藥兩界事業之調查，並介紹各國醫藥兩界的舊事業及新發明。²⁴

²¹ 〈訪事員規則及要目〉，《江西》第1期（1908年7月9日），無頁碼。

²² 〈本社重要廣告〉，《四川》第1期（1908年1月），無頁碼。

²³ 〈法政學交通社章程〉，《法政學交通社雜誌》第1期（1907年1月），頁1-6。

²⁴ 〈中國醫藥學會簡章〉，《醫藥學報》第1期（1907年2月13日），頁1-3。

留日學生之所以熱衷於調查活動，一方面認為這是現代國家的指標。湖北同鄉會稱，「調查之事，則主人翁之事也。」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要擺脫奴隸而臻於主人之地位，必須了解自身的強項及弱項，調查即是掌握這些知識的途徑：「舉一省鉅細之務，而一一歸其運籌，一一受其支配，以為吾國民發其智、通其情、興其利、剔其害。凡有為主人翁思想者，必當於此乎。」²⁵浙江同鄉會調查部亦言：「外人之於國也，有政府之調查會，有民間之調查會。大凡一團體之中，苟其事於權利界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者，靡不有調查會……故一國之中，上自朝政，下逮民俗，舉凡興一利，剔一弊，皆先有所根據，不致瞽惑而無所措……國之暴富驟強，蓋有繇來，非偶然也。」²⁶對這些留日學生來說，調查不僅具有知己知彼的實質效用，也是國力的象徵。

另一方面，留日學生還把調查視為將來實施地方自治的基礎。早在1890年，浙江舉人陳虬（1851-1904）即倡議在各州縣設立「議政院」，以通下情。同年浙江進士湯震（?-?）亦主張設立地方議會。²⁷稍後立憲派張謇（1853-1926）和維新派梁啟超（1873-1929）分別著書鼓吹地方自治，一時之間，在青年學子間形成風潮。²⁸值得注意的是，清末知識分子追求的地方自治，非為與中央抗衡，而是因應中國幅員廣大的治理策略——這也是留日學生提倡分省調查的原因：「疆與疆合，人與人合，事與事合，疆無不治之疆，人無不治之人，事無不治之事，而中國遂為完全無缺之自治國矣，是以吾浙江留學生之有同鄉會也，應辦之事千名萬族，必自調查全省十一府七十二州縣

²⁵ 〈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29日），頁136。

²⁶ 〈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²⁷ 沈懷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頁166-167。

²⁸ 馬小泉：《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0-41。

始。」²⁹「援由鄉及國之義，暫以湖北一省為初點，俟各省之調查部皆自完其綱領，而後徐圖併一之，非敢自相畛域也。」可見留日學生同鄉會規劃各省調查，雖名為地方自治，但最終目標仍在「效其力於中國者」。³⁰

留日學生所發行的期刊在國內相當有市場，所發起的調查運動亦得知識界的響應。如1903年江蘇無錫文人許脩直（1881-1954）、陶仲實（?-?）、朱鹿卿（?-?）等鼓吹成立「新無錫會」，附設調查部以「改良學界、革新社會、組織地方自治」；³¹同年由福州黃展雲（1875-1938）領導的海濱公會亦設調查部，進行政治、學界、風土民情及物產調查，以便「增廣智慧，維持公益」；³²1904年浙東士人劉琨（?-?）、盛俊（?-?）、張恭（?-?）等人創辦的《萃新報》時，提議設置「處金衢嚴四府調查會」；³³同年江蘇常熟報人丁初我（1871-1930）創辦的《女子世界》，下設調查部專門收集女學情報；³⁴1908年創立於武漢的《江漢日報》動員大批人力進行實地調查，「先從實業及軍界入手，次及於丁數戶口、風土人情。無事不搜，無物不備，宏綱細目，概括靡遺。」³⁵晚清士人對調查活動的興趣，可見一斑。又，根據上海圖書館的「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以

²⁹ 〈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³⁰ 〈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湖北學生界》第1期，頁131-132。

³¹ 〈專件：新無錫會〉，《童子世界》第33期（1903年6月16日），頁37。

³² 〈紀實界：海濱公會總則〉，《蘇報》第2508號（1903年7月2日），頁3。關於黃展雲生平，參閱李錫貴：〈黃展雲在光復前的革命活動〉，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福建文史資料》第27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20-123。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檔案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福建省委員會編：《辛亥革命福建英傑圖志》（福州：海峽書局，2011年），頁205-207。

³³ 〈處金衢嚴四府調查會之緣起（附辦法體例）〉，《萃新報》第2期（1904年7月11日），頁1-2。

³⁴ 〈女學調查部專約〉，《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無頁碼。

³⁵ 〈調查啟示〉，《江漢日報》，1908年6月17日。轉引自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頁32。

「調查」進行題名的精確檢索，1897-1911年間共出現7,261篇，且自1903年起，篇數大幅增加，尤其到了1908年之後，調查文章超過千篇，到了1910年達1,685篇，為1907年近兩倍，這個結果雖然也和期刊數的增加有關，但從表1可以看出，題名含「調查」文章數的攀升速度遠超過新增期刊數，可見「調查」是晚清中文期刊上使用量快速成長的熱門詞彙。

表1 晚清報刊文章題名含「調查」之篇數

年代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調查篇數	1	3	3	8	4	10	111	164
新增期刊	17	14	5	7	10	25	28	26
年代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調查篇數	323	928	838	1,082	1,655	1,685	446	
新增期刊	27	38	48	58	49	63	56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編：《全國報刊索引·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³⁶

晚清學子對於調查的興趣，除了出於社會改革的熱情，也與清末科學制度的變化有關。1901年，清廷下詔廢法八股，改試策論，並加入大量的實學科目，「調查」被視為求取學問的新方法，而統計又被視為呈現調查結果的重要工具。例如，1903年湖南省鄉試有一道題目：「泰西以統計之法編次為表，為一切施政之方，近日本亦設統計

³⁶ 網址：<https://www.cnbkys.com/search/advance>，檢索日期：2022年8月1日。

院，是否便於仿行策」，促使考生思考「調查」的重要性。³⁷在「讀書為求功名」的價值取向下，科舉出題方向影響士子的學習範圍；當在上位者把調查統計視為施政之方且列為策論試題時，士子應時勢所趨，勢必需要增加相關知識。

三、調查文類的界線

調查是什麼？它應該包含那些要素？這是界定調查的基本問題，但研究者對此似乎仍莫衷一是，難有定論。學者李章鵬和牟永如都利用上海圖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統計清末刊有調查專欄及調查文章的期刊數，惟所得結果並不完全相同，³⁸從設置專欄的期刊數來看，兩者在1901-1904年呈現相同趨勢，但之後的峰頂、峰谷卻呈現相反的走向（圖1），再從刊載調查文章的期刊數來看，兩者在1904年後，亦呈現相反的走向（圖2）。可能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計算依據不同；由於李章鵬和牟永如均未說明調查文章的認定標準，無法確定他們是否在同一基準點進行統計。不過，這個比較突顯了兩個值得觀察的重點，第一，除了文章標題之外，兩者均注意到期刊設置調查專欄的現象，也就是說，晚清期刊編輯認為這是一種被賦予特定意義與價值的文本，值得獨立成類；這使得計算設置調查專欄的期刊數有合理的基礎。第二，「調查」並非有著明確而穩定邊界的文類；許多期刊即便都使用「調查」作為專欄名稱，並不代表其中的文章都屬於同一類型的文本。反之，在一份刊物中，調查性質的文章也可能被置於不同的欄目——這在調查文類成形的晚清更為明顯。

³⁷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頁124。

³⁸ 圖1及圖2的數據來源，參閱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頁81；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頁37。牟永如只統計到19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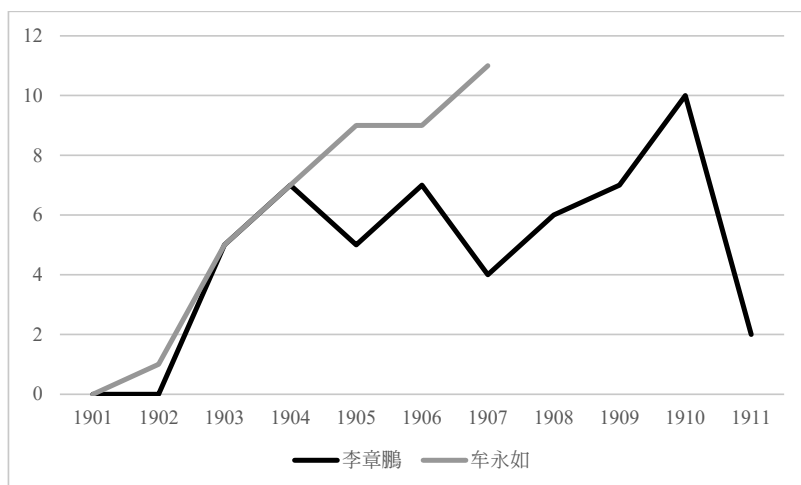


圖1 設置調查專欄的期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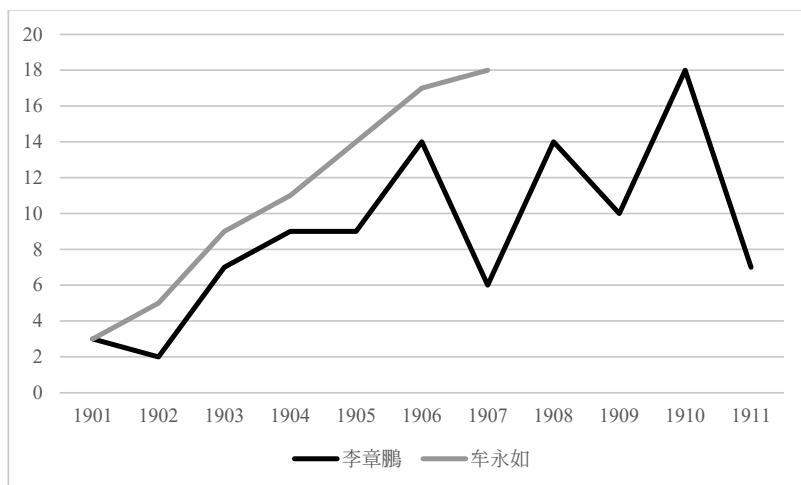


圖2 刊載調查文章的期刊數

湖北、浙江、江蘇同鄉會在成立之初，已注意到調查是一種表述知識的新方式，因此也嘗試為這種文類劃定界線。《湖北學生界》最早公布〈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解釋為什麼需要作調查，該作哪些

方面的調查。《浙江潮》不但在同鄉會章程之外，另訂〈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還經常以「緊要廣告」的方式宣達「調查」的定義。

《江蘇》也在創刊號公布〈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釐清調查員的任務，並界定調查綱領及順序。根據這些敘例公約可以看出，調查的第一個特點是親自採集的一手資料，尤以親身觀察者為上乘。如前所述，留日學生同鄉會在各地（包括東京、原鄉及其他地方）徵求調查員，《浙江潮》甚至發下宏願，希望在省城設立調查總會，於府縣設立調查支會，省城調查員應有十餘人，府城至少有七、八人，縣城至少有四、五人。《江蘇》則提議每府及每縣均設調查員五名，擔任分業及分境調查——這種依行政區域及行業別的組織方式，強調的是調查員的「在地性」。此外，《浙江潮》及《江蘇》均表示，行有餘力時將提供經費，以利進行實地調查。以學生社團普遍經費不足的狀況，還能主張公費調查，顯示他們對調查的重視程度，並認定「親歷」是調查的必要之舉。³⁹

其次，調查報告與新聞紀事被區分為不同的文類。19世紀中國出現的新式報刊，不但改變了人們傳播知識的管道，也創造新的文體。李良榮指出，早期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字林滬報》和《申報》上的新聞或通訊，都帶有小說、記敘文、傳記、遊記的色彩，而新聞評論更有桐城派或八股文的影子。到了19世紀末，獨立於古典文學之外的報刊文體逐漸成形，政論時評脫離「代聖立言」的文章義法，而藉由針砭時事表達個人的政治主張；通訊消息也從夾議夾敘走向事實報導——正如1904年《時報》所主張，新聞必須符合「博」、「速」、「確」、「直」、「正」等條件。⁴⁰從這個角度看，新聞與調查的共同特點是呈現真相。不過留日學生已意識到兩者的差異，《江蘇》宣稱「本部調查非新聞記載有聞必錄者可比，無取

³⁹ 〈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頁3。〈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⁴⁰ 李良榮：《中國報紙文體發展概要》，頁1-62，尤其是頁48。

摭拾風聞，滋生岐說，詳瞻確當，斯為切實有用之調查。」⁴¹《浙江潮》調查部還發出特別廣告：「本部成立後，內地會員投寄稿者絡繹不絕，同人良深感謝，惟來稿均仿新聞之例，與本部調查章程多有未合，或且枝枝節節，未成片段。」⁴²換言之，相對於新聞的「有聞必錄」、「風聞岐說」、「枝節斷片」，調查要求更高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浙江同鄉會調查部甚至宣示「調查錯謬之處，凡我浙人皆有檢舉之責，儘可移函辯論，惟須實有確據。」⁴³

其三，調查需具備「切實有用」的特性。如前所述，留日學生均認為調查是興利除弊的工具，也是實施地方自治的預備工作——而這正是與新聞最大的差別。所謂的「切實有用」，其實是站在治理的角度而言，例如《湖北學生界》列出優先調查的主題包括政法、教育、經濟、實業、軍事、歷史、地理、民族、出產、交通、外人勢力等11類，調查事項亦多統治者或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視角，對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一定「切實有用」。⁴⁴再以《浙江潮》為例，前述該刊對於許多作者無法分辨調查與新聞頗有微詞，為引導調查寫作，還對調查主題給予具體建議（見表2）。從這張示範清單可以看出，該刊主編對經濟生產、教育文化等課題特別重視，而這正是清末知識分子衡量現代國家的重要指標。此外，從提問的方式也可看出，《浙江潮》偏好以數字和表格呈現調查結果，但不強調數字背後的脈絡，這一點後文將進一步討論。

⁴¹ 〈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頁3。

⁴² 〈調查部徵事特別廣告〉，《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無頁碼。

⁴³ 〈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⁴⁴ 〈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湖北學生界》第1期，頁137-145。

表2 《浙江潮》建議的調查命題

人民之營業及生計	某府社會上最重業何種	某業組織若何 某品出省某品出口 某品出省出口由何地 外品輸入者有幾種 每業歲得利之中數 每業得息歷歲比較表
	某府民間生力若何	某地歲需米若干 是地出米若干輸入米若干 是地兼食雜糧否 鹽蔬大概情形 布物大概情形
絲茶種種內情及現象	絲例	每府歲種桑若干地 某地以繭某地以絲 歲得絲繭中數若干 近年絲繭輸出比較表 所銷處何地 養蠶法 新舊法比較成色表
	茶例	種茶何地 何地為多 每地歲出若干 近來輸出比較表 所銷處何地 製茶法
學校（私立／官立）	管理人及教習辦事人之姓氏爵里 設立年月表 校用經費何出 校內科目若干 校用何課本 生徒實數若干	

<p>報紙銷行之多寡數 並歷年比較</p>	<p>某地銷何種報紙 每種銷若干 受銷者為何種社會 某地銷報歷年比較表</p>
---------------------------	---

資料來源：〈調查部徵事特別廣告〉，《浙江潮》第3期，無頁碼

儘管《浙江潮》等刊物試圖界定調查文類的性質與邊界，但實際操作上卻相當困難，這可以從調查專欄與其他欄目的混雜一窺究竟。以下本文將利用《浙江潮》、《江蘇》、《雲南》，進行欄目及文本分析。這三份刊物均由留日學生在東京所創辦，主要編輯（見表3）多支持反滿革命，其中不乏光復會及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成員，這些刊物也就成為散播革命思想和推動地方自治的宣傳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份期刊較少揭露調查文章的作者，《浙江潮》和《江蘇》還聲明，除非作者自願，否則概不公布調查員的爵里姓氏，遇有祕密調查者，該刊有權隱去作者身分，以保護消息來源，⁴⁵因此該刊調查欄的作者大都佚名，或僅署「調查員」。《雲南》的調查欄目除了「調查員」、「訪員」等無身分識別的署名外，也出現幾位具名作者，其中雪生、直齋分別是幹事李根源、趙伸的字號，在調查欄目分別發表文章4篇和3篇，這也可以看出編輯主導調查欄目的程度。

表3 期刊編輯群

期刊	編輯群
《浙江潮》	孫翼中 (?-?)、蔣百里 (1882-1938)、王嘉榘 (1879-1912)、蔣智由 (1866-1929)、許壽裳 (1883-1948)

⁴⁵ 〈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頁3。〈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期刊	編輯群
《江蘇》	鈕永建（1870-1965）、汪榮寶（1878-1933）、秦毓鎣（1880-1937）、陳去病（1874-1933）
《雲南》	李根源（1879-1965）、趙伸（1876-1930）、張耀曾（1885-1938）、席聘臣（1882-1930）、孫志曾（1873-?）

資料來源：《江蘇藝文志》及李根源、秦毓鎣、劉訓華等文⁴⁶

表4所列為《浙江潮》、《江蘇》、《雲南》曾出現過的專欄，從欄目來看，這三份期刊的編輯方針大同小異，依文章性質大致可分為論說（社說、論著、學術、時論、譯述）、文學（小說、文苑）、雜錄三類，前兩類文章的內容與形式比較確定，易於歸類，雜錄則包羅萬象，舉凡新聞、掌故、通信、消息等均包含在內，本文所關注的調查亦屬此類。雜錄類的欄目並沒有明確的邊界，同樣類型的文章可能被歸在不同的專欄中。例如《江蘇》創刊號的雜錄欄下設有子目「雜俎」及「餘錄」，前者收有〈世界人口之比例〉、〈世界生死之數〉、〈世界之死人〉等文，後者則有〈中國人口最近之統計〉和〈世界國勢一斑〉——光從文章主題其實很難界定這兩個子目的差異。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調查欄目。如表4所示，三份期刊均設有調查專欄（劃粗底線者），但其他欄目也出現了類似調查的文章（劃細底線者）。

⁴⁶ 資料來源：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江蘇藝文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703。李根源：〈序〉，收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頁2。秦毓鎣：〈天徒自述〉，《近代史資料》第111號（2005年7月），頁141。劉訓華：〈近代留日學生的革命性——對《浙江潮》編輯群的歷史考察〉，《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頁125-129。

表4 期刊的專欄名稱⁴⁷

期刊	專欄
《浙江潮》	圖畫、社說、論說、學術、大勢、記事、雜錄、小說、 <u>新浙江與舊浙江</u> 、文苑、 <u>調查會稿</u> 、談叢、時評、 <u>日本聞見錄</u> 、 <u>附錄</u> 、專件、雜文、通信、所聞錄、浙江文獻錄
《江蘇》	圖畫、社說、學說、譯篇、時論、小說、記言、記事、雜錄、 <u>調查錄</u> 、來稿、傳記、 <u>大勢</u> 、文苑、時評
《雲南》	圖／插畫、論著、譯述、文苑、白話、談叢、雜俎、雜纂、 <u>來稿</u> 、小說、 <u>調查</u> 、 <u>歐洲通信</u> 、 <u>訪函</u> 、 <u>來函</u> 、 <u>附錄</u> 、時評、記事、傳記、專件

根據《浙江潮》「調查會稿」和《江蘇》「調查錄」的50篇文章標題來看，調查文本有兩個基本要素：調查地點和調查項目；標題最常出現的詞綴是「表」，共有28次，其次是「數」，有11次，「調查」有8次，「一覽／一斑（班）／一般」有5次。⁴⁸其他欄目中也有具調查意義的文章。不但如此，同一類型的文章被歸為不同專欄的情形，亦屬常見。如《江蘇》第4、5期刊出的〈武陽土產表〉被歸在「調查錄」，第11、12期的〈太倉物產表〉卻置於「本省雜錄」。

相較於《浙江潮》和《江蘇》對數字及表格的著迷，《雲南》則偏好以連篇累牘的長文來描述調查結果，文章標題詞綴較多「情形」、「記」、「現象」、「近狀」等語。值得注意的是，《雲南》

⁴⁷ 本文所使用的專欄名稱與文章篇目，源自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頁785-795、1087-1096、2027-2039。上海圖書館編：《全國報刊索引·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網址：<https://www.cnbkisy.com/>，檢索日期：2021年6月24日。

⁴⁸ 這個統計合計超過總篇數50，因為某些篇章同時使用兩種高頻詞綴，不過這個統計還顯現出調查欄目對於表格及數字等知識形式的偏好。

自創刊起，每月均刊出〈大事月表〉，乃摘錄國內外報刊的新聞，第1期自成一欄，第2期置於雜纂欄，第3期起改入調查欄，第8期以後則列為「記事」；換言之，該刊的調查與新聞並沒有十分清楚的界定。此外，署以「視查員」、「訪事員」等無指涉性、但具有調查性質的稱謂，常出現在「來稿」、「訪函」、「來函」等非調查欄目；事實上，第4期把「來電及來函」的文章置於調查欄內，由此顯示這些欄目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儘管調查專欄作為調查文本的判定標準存在一定的限制，欄目的劃分並非全然無效。從表4可以看出，調查文章並不會被歸類在「社說」、「論著」、「學術」，而以其紀實的性質，也不會出現在「文苑」、「小說」、「傳記」的文學欄目——這個性質說明晚清調查文類正在成形中。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文本來自三份期刊中「具調查性質」的173篇文章，包括調查專欄的所有文章和其他欄目中具調查意義者——後者指的是具有調查欄目文章的高頻詞綴（如表、數、調查等）的其他欄目文章，和署名調查員（及其同義詞）的文章。表5所示為調查文本所屬專欄的分布統計，可以看出《浙江潮》的調查文章出現於調查專欄的比例最高，而且在非調查專欄的文章主要出現於第2期，顯然該刊調查欄目的定型程度較早也較高。相較之下，《雲南》列入調查專欄的文章僅占全部調查文本的20%，可見該刊調查專欄的邊界較游移不定。

表5 調查文章所屬專欄的分布統計⁴⁹

專欄	《雲南》	《浙江潮》	《江蘇》	總計	說明
調查	18			18	

⁴⁹ 本表的統計篇數以有全文者為準。前述提到《浙江潮》與《江蘇》的調查欄目共50篇，其中有2篇刊登於《浙江潮》第12期，然而該期僅存篇目，未有全文，因此不列入本表之統計。

專欄	《雲南》	《浙江潮》	《江蘇》	總計	說明
訪函	51			51	集中於第6期，有34篇
來函	5			5	第1、6期
來稿	9			9	
專件	2			2	第10、11期
附錄	2	3		5	
調查會稿		32		32	
日本聞見錄		2		2	第2、3期
時評		1		1	第2期
新浙江與舊浙江		2		2	第2期
調查錄			16	16	
本省雜錄			13	13	第11/12期
雜錄			4	4	第2、9/10期
餘錄			2	2	第1期
大勢			2	2	第8期
學界述聞			1	1	第4期
記事			1	1	
無專欄名	3	2	2	7	
總計	90	42	41	173	
列入調查專欄的文章所占比例	20%	76%	39%	38%	

四、調查文本的內容分析

（一）調查的主題

晚清知識分子所感興趣的調查主題是什麼？他們如何描述所調查的對象？關於這個問題，過去研究者多半直觀地從標題來判斷和分類。例如李章鵬從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出939篇調查文章，並將之分為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教育、法政及綜合等6大類，在各類以下又有細項，如經濟調查下分為商務、物產、實業、金融、度量衡、交通和其他等項，實業之下又分為實業綜合、工業手工業、礦產、農業等目。⁵⁰ 這種樹狀階層式分類法的優點是一目了然，而且計數容易，不過操作時依賴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尤其當調查報告涉及多重類別時，可能因分類標準不一，導致歸類的差異，且後繼研究者難以核實資料，如前述李章鵬和牟永如兩者的統計資料呈現完全相反的走向（見圖1、2）。因此本文將借助共現詞網絡的分群運算，以數位方法協助探勘調查文本的主題及書寫特色。

共現詞網絡的方法，是將文章與文章內詞語的關係視覺化為網絡圖，以下以3篇文章（A、B、C）與5個詞語（a、b、c、d、e）的關係為例，文章A有詞語a、b、c、d、e，文章B有詞語a、b、c，文章C有詞語a，所以共有8個節點（nodes），9條連結（edges）（如表6），此關係表視覺化為網絡圖（圖3），節點大小會根據連結數量顯示，分布會將有共同連結的文章與詞語拉近，反之推遠。⁵¹ 如圖3所示，文章A包含的詞語最多，故節點最大，詞語a為3篇文章之共現詞，故居於三者之中，且因連結文章數最多，節點也較其他詞語大，文章C由於只有詞語a，故為文章中節點最小，且位於邊緣。

⁵⁰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頁85-87。

⁵¹ 依Force Atlas2布局，運算時節點之間會互斥分離，若存在連結則會吸引拉近，如此斥力、引力平衡後，得到最後布局。

表6 文章與詞語關係表

	a	b	c	d	e
A	1	1	1	1	1
B	1	1	1	0	0
C	1	0	0	0	0

說明：1表示有連結，0表示無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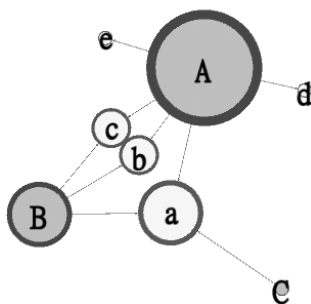


圖3 文章語詞與網絡圖

本文根據此方法建立三份期刊的共現詞網絡，首先將上述173篇調查文章全文製作語料庫（corpus），利用中央研究院發展的斷詞系統Ckip Tagger分詞，⁵²並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的「漢語新詞資料庫」為詞典，⁵³優先區分出「新詞」。所謂「新詞」，是指19

⁵² 斷詞系統Ckip Tagger，網址：<https://ckip.iis.sinica.edu.tw/service/ckiptagger/>，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4日。

⁵³ 漢語新詞資料庫，網址：<http://140.109.240.65:8080/vocabulary/index.php>，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4日。目前仍建制中，尚未對外開放。該資料庫乃根據辭典及相關研究者詞表所建立，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中納言」資料庫；黃河清：《近現代漢語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朱京偉：《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軌跡》（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等。由於不同

世紀中葉以來，社會改革者引進外來知識時所創造或挪用的新詞彙，尤其借用日文中的「新漢語」。近代中國與日本之間詞彙交流情形極為複雜，大致可分成兩種類型：回歸詞與日源詞，前者是指漢語傳入日本，再添加新意傳回中國，後者則是漢語借用日語形、音而來的新詞彙，兩者的界定端視能否找到漢語出處而定，故分類準會隨史料更迭。⁵⁴晚清留日學生熱衷翻譯新知識、引介新語彙，像《江蘇》編輯汪榮寶還在創辦刊物當年，出版中國最早的日語外來語辭典《新爾雅》。⁵⁵可見日語新詞是晚清期刊的文字特色，因此本文將之列為詞彙分析的重點。

分詞之後，我們篩選出現3次（含）以上的詞語，過濾日期、數字，排除停止詞，可得3,472個詞語，⁵⁶共有3,645個節點和13,971條連結。⁵⁷為簡化詞語網絡並找出緊密關聯的群組，篩選至少出現於5篇文章的詞語，得到1,018個節點（28%），7,416條連結（53%），最

資料來源的界定不同，如「革命」於《新華外來詞詞典》，被界定為「回歸詞」，但在《近現代漢語辭源》被界定為「日語借詞」。本文擱置爭議，若有被任一資料來源者歸於「日語借詞」者，均算是「日語借詞」，共得2,123個二字以上（含）的新詞。

⁵⁴ 呂文濤：《語文接觸視閥下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6-7。

⁵⁵ 原書為《新爾雅》，1903年出版，後由沈國威整理編著，見沈國威：《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⁵⁶ 首先合併異體字詞，如鐵（銕、鉄）、款（欸）、函（函）、耶蘇（耶穌）、礦（鑛）、興祿（興碌）、體（体）、雜誌（禠誌）、砲臺（砲台）、青（青）等。其次挑選詞頻為3（含）以上的二字詞，藉此排除冗餘分詞，過濾英文、數字（1、2、六七、卅……）、等級（第一、第二……）、日期（初八、廿日……）等，再建立停止詞詞典，排除詞頻大於3次而不具意義的連結詞，如「不論」、「無論」、「至于」等，共356個。篩選出來的詞語設為權重辭典，再投入Ckip Tagger系統，重新分詞，此步驟重複四次，以篩選出更精確分詞。分詞以二字詞以上為原則，單字詞僅挑選出自我指稱（我、吾）、情感嘆詞（悲、噫、惜）、地名簡稱（滇、浙、皖、湘、粵、黔）等11個。

⁵⁷ 詞語連結的計算是以文章為單位，每個詞語至少連結到一篇文章，該詞語不論在單篇文章中出現幾次，都以一次計。詞語連接到的文章篇數，即為該詞語的連結數。

後留下至少出現於5篇文章的共現詞811個，且至少有5個共現詞的文章168篇，視覺化為三份刊物的共現詞網絡（見圖4）。共現詞網絡中的綠、藍、黃色節點分別代表《雲南》、《浙江潮》、《江蘇》的文章，灰色節點為一般詞語，紅色節點為新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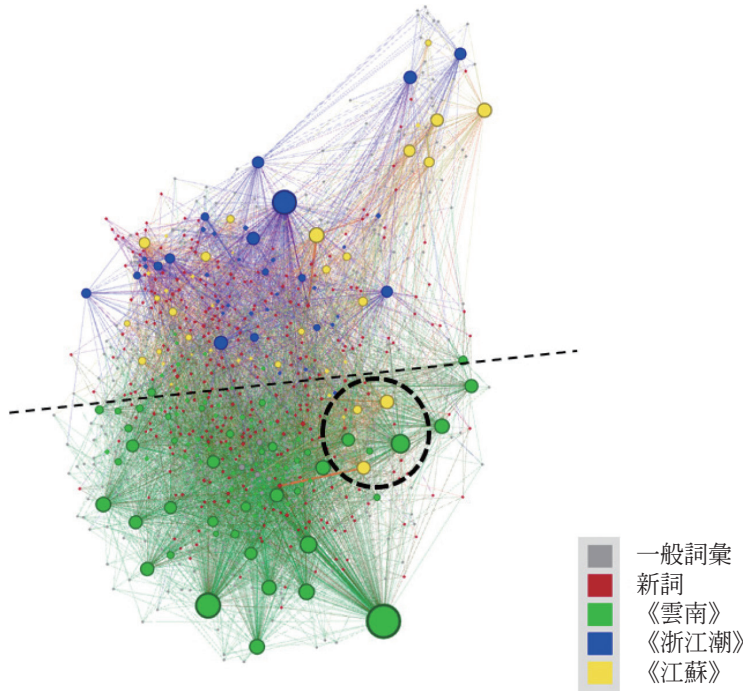


圖4 《雲南》、《浙江潮》、《江蘇》的共現詞網絡

從新詞比例來看，出現3次以上的詞語有3,472個，其中新詞有850個，占24.5%。但若以期刊各篇文章的平均使用新詞比例來看，三份期刊使用新詞的比例均達3成以上，這是因為每個新詞平均出現12次，高於其他高頻詞的8次，所以分布於各篇的比例較高。⁵⁸ 其

⁵⁸ 高頻詞3,472個，出現總次數為28,026次，平均每個出現8次，高頻日語借詞850個，出現總次數10,133次，平均每個出現12次。

中，《浙江潮》使用新詞的比例最高，達35%，《雲南》和《江蘇》的占比分別是32%和31%，⁵⁹此高比例的新詞使用量，為留日學生的用語特性：他們熟悉新詞的使用，並試圖引進新知識和新觀念，在清末的報刊中，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朱京偉的研究指出，《時務報》（1896-1898）、《清議報》（1898-1901）、《申報》在1872-1896年間已屢見新詞，此為新政支持者和新媒體的特質。⁶⁰事實上，沒有新詞不僅無法接收新知，也會失去發言權，甚至造成理解、闡釋、溝通的障礙。⁶¹

圖4的共現網絡詞群分布中，虛線以上的黃色與藍色節點距離接近且交錯分布，代表《江蘇》和《浙江潮》有較多共現詞彙；虛線以下多為綠色節點，意即《雲南》自成一格，與其他兩份刊物的共現連結相對較少。比較明顯的例外是黑色線圈部分，黃色節點（《江蘇》）落入下半部，以綠色節點（《雲南》）為主的分布中。這幾篇文章為《江蘇》〈中國所失礦權之一斑〉、〈支那之煤〉、〈中國鐵路之現狀及將來〉，它們與《雲南》的〈中國礦場調查錄〉、〈滇人駐緬之狀況〉、〈騰越關之商務〉接近，共現詞有礦山、礦物、鐵道、權利等，內容都是討論礦產、鐵道主題。由此可推論，因共現詞連結多而聚攏的文章，因使用共同詞語，更可能討論相似主題，研究者可根據共現網絡，探勘因共現詞連結的主題分布。因此，我們進一

⁵⁹ 各篇日語借詞計算是以不計算重複詞語為準，如該篇「日本」出現10次，以1次計，再計算出3份刊物的平均值。若將重複計算列入，日語借詞的總出現次數，仍以《浙江潮》的33%最高，《雲南》和《江蘇》分別是31%和30%。兩種計算結果的差異不大。

⁶⁰ 《時務報》二字新詞有124個，《清議報》有125個，《申報》有132個，見朱京偉：〈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時間溯源——以《申報》和其他5種清末報刊為例〉，《日語學習與研究》2020年第4期（2020年8月），頁1-10。該文僅計算新詞出現的次數，而未計算與非新詞的比例。中文斷詞程序複雜，增加了計算新詞使用比例的難度，故本文進行四次斷詞的清理，以計算新詞占總詞彙的比例。

⁶¹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2003年），頁188-189。

步將共現詞網絡依節點的群聚係數運算，可得6個子群，⁶²根據各群的篇名題旨，可歸納出6個主題：（一）物產、（二）產業、（三）學務、（四）國際、（五）邊防、（六）揭弊（表7），並統計三份期刊於各主題的次數分布（表8）。

表7 主題群文章分布表

分群	篇名
物產	紹興新昌縣物產表、嘉興平湖縣物產表、處州青田縣調查稿、湖州物產生利記、處州宣平縣之種種調查、浙省銷場稅之一斑、杭州輸出貨大宗數目表、武陽土產表一目錄 農圃、武陽土產表二目錄 樹藝、武陽土產表四目錄 製造、武陽土產表三目錄 畜牧、嘉定農人生計、太倉物產表 植物產表一、太倉物產表 動物產表二、高郵之調查（風俗、生計）
產業	臺州甯海縣之種種調查、浙江省防調查表、三門灣緊要調查書、海鹽地理之關係沿革、紹興全府當業架本調查表、紹興府山陰會稽兩縣耶蘇教會表、嘉興海鹽縣之慈善事業、杭州外省輸入貨大宗數目表、浙江運河輪船通行表、江蘇內河之航業、高郵之慈善事業表、官書局之可惡

⁶² 群聚係數是計算節點間的相似程度，有共同連節點者，相似度愈大，反之愈小，最佳化分群目標是讓分群間的差異最大化，分群內的差異最小化。分群的依據是節點間的連結性，其原則是同群間節點間距離愈小，分群間距離愈大，則分群效果愈好。運用“gephi”分群計算（modularity），設定解析度（resolution）為1.5，可分為6群。

分群	篇名
學界	<p>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省會學校一覽表、溫州瑞安縣城內教育區所表、東京雜事詩、浙江同鄉留學東京題名、臺州黃巖縣城內學界區所表、杭州金融機關組織表、分校分府現在人數統計表、溫州樂清縣教育部、壬寅卒業諸君題名、寧波奉化縣學校一覽、海鹽報紙之銷數、杭城報紙銷數表、紹興府城內書鋪一覽表、<u>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u>、<u>上海學堂一般</u>、<u>常昭調查一斑</u>、<u>嘉定談</u>、<u>崑山學界談</u>、<u>太倉官學堂之腐敗</u>、<u>淮安山陽縣調查稿</u>、<u>常熟學界調查報告</u>、<u>鎮江學堂興廢表</u>、<u>高郵之學界</u>、<u>高郵之紳董</u>、<u>嘉定城廂內外學界表</u>、<u>揚州學界區所表</u>、<u>揚州城內教堂全數表</u>、<u>太倉書報社</u>、<u>嘉定學院書院學堂產業表</u>、<u>太倉員警之無賴</u>、<u>嘉定科田畝表</u>、<u>鶴慶州之五大特色</u>、<u>法政學紳之特色</u>、<u>高等學堂郎監督之外交</u>、<u>官報局之可笑</u>、<u>法政教習之效尤</u>、<u>公學會之成立</u>、<u>實業學堂之發達</u>、<u>不學之教員</u>、<u>蠶桑學生之可敬</u>、<u>義務學堂之創立</u>、<u>滇人之憤激及地方自治思想之發達</u>、<u>法政學生之腐敗</u>、<u>運動會之開會</u>、<u>挨戶斂錢</u></p>
國際	<p>日本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觀覽記、各省人口現在數、日本神戶大坂兩埠居留之浙商人數事業及與各省人數比較說、日本之外人囚表、杭州外國輸入貨大宗數目表、<u>中國所失礦權之一斑</u>、<u>中國鐵路之現狀及將來</u>、<u>癸卯年上海商情述略</u>、<u>支那之煤</u>、<u>日本在滿州國人數</u>、<u>中國人口最近之統計</u>、<u>調查簡啟</u>、<u>世界國勢一斑</u>、<u>世界金銀產出額表</u>、<u>第五號大事月表</u>、<u>中國礦場調查錄</u>、<u>足尾銅山視察記</u>、<u>第六號大事月表</u>、<u>足尾銅山視察記（續）</u>、<u>滇越鐵道之現狀</u>、<u>最近法國之舉動</u>、<u>法人對滇之近狀</u>、<u>法人移兵三角洲</u>、<u>英人對於法人謀滇之意見</u>、<u>哀越吊滇</u>、<u>雲南內憂之可慮</u></p>

分群	篇名
邊防	海鹽縣徵米徵銀之實數、 <u>太倉之科舉思想</u> 、 <u>太倉紳董之特質</u> 、滇邊務及鐵道之實況、騰越關之商務、廣西人生命之警報、滇緬界事述略(續)、永昌府來函：永郡官紳之怪現狀、永昌府屬歷史上之遺蹟、滇緬界事述略、咄咄法人干涉雲南教育權、辦理蓋達案件述略、記興祿事略、滇人駐緬之現象、旅緬滇僑之現象、遊滇述略、浪穹最近之怪現狀、滇官吏媚外之醜狀、雲南賑米轉運局之腐敗、滇邊近事、滇人痛淚、越南來函、雲南迤西鹽政慘酷、賓川慘事、騰越之鎮道、民賊提督、法人探險及圖謀雲南之早時期、來函：雲南水旱災募捐公啓、安南人種之調查、公學會之熱心公益、假託品行取人之荒謬、駐緬華商無領事之苦、盜賣雲南之賊、賑飢民乎抑賑餓虎也、縣令政績、邊吏貪劣、滇越鐵路之狀況、越南來函、看！看！！看！！法國雲南之殖民康健、葫蘆王地之關係、河口兵卒警察之腐敗、安南慘狀一節、省城演說會之成立、宜邑新軍之腐敗、施棺會之棺木告盡、岑督電覆滇學界、丁督有合辦密約、豪哉購米賑荒委員、不允賄和、商號爲法作僂及軍事上規查之概況、北洋陸軍學生之到著、省城鐵路公司之現象、戲曲改良之建議、蒙領事大修監獄、盜風日熾、悖入悖爾
揭弊	記杭州放足會、杭州放足會第二次調查信、雜俎、留法學生上滇督書、調查河口情形記、賓川州民賊代興、越南北圻駐紮實數、法兵入滇之蒿矢、法人動靜、陸軍學堂教員何鴻翼之腐敗、濫誣學伸、東川府幾興疑獄、英人舉動之一斑

說明：一般字體為《浙江潮》，底線為《江蘇》，粗體為《雲南》

表8 調查文章的期刊及主題分布統計

刊名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雲南》	0	1	14	12	53	10	90
《浙江潮》	7	9	14	5	1	2	38

刊名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江蘇》	8	2	18	9	2	1	40
總計	15	12	46	26	56	13	168

就表7的篇名題旨及表8的分布統計來看，「物產」、「產業」兩主題主要出現在《浙江潮》與《江蘇》，該主題文章主要以表列方式呈現，《雲南》缺乏此類調查表，雖有一篇〈官書局之可惡〉列在「產業」主題，但細究內容卻不甚相關，這是因該篇僅有50字，7個高頻詞，其中有3個高頻詞分於此類所致（價昂、辦事、居心）。由此可知，共現詞分群計算的局限性，它可提供視覺化的概觀，並推測出全局的分野，但在細微處，還需要人工檢閱，研究者可根據內容題旨，分辨出少數例外。「學務」為三份期刊所共同關注，留日學生的切身題旨，關注教育、學界，知識分子的處境，包括學堂、學生數、科目，乃至學務糾紛，在推動新式教育與舊學交替的轉型時刻，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國際」主題，則為次要關注主題，是以留日編輯群於日本境內的考察報告，呈現其跨國視野，並表列各國的統計數據。

最後兩個主題的篇名題旨相近，定名為「邊防」、「揭弊」，都以揭露政治腐敗與弊端的長文為主，絕大多數出現於《雲南》，在總數69篇文章中，占了63篇（91%）內容強調滇境邊防問題，官府腐敗無能，境外勢力侵擾。《江蘇》的〈太倉之科舉思想〉和〈太倉紳董之特質〉兩文，力陳學界的腐敗、媚外、未開化，列於「邊防」主題。《浙江潮》的〈記杭州放足會〉和〈杭州放足會第二次調查信〉，揭露纏足惡俗，未及外事，被列入「揭弊」主題。

整體而言，三份刊物的主題分布，相當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雲南地處西南邊境，但自19世紀下半英法兩國分別取得緬甸和越南為殖民地後，交界的雲南就成為外國勢力覬覦的對象，英法兩國

除了要求開放通商口岸，設立海關，也籌議修築鐵路，並入滇考察礦產。⁶³這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乃喪權辱國之兆，因此《雲南》亟於披露礦產、鐵道、邊防的調查結果，以警世人。相形之下，江蘇和浙江素稱「魚米之鄉」，這兩省的知識分子更關注的是物產和產業調查，以了解其經濟實力。

為進一步解讀調查文本的書寫特質，我們將6個主題的高頻詞，依詞彙性質分為11類（附錄），⁶⁴並統計其次數分布（表9），藉此分析每種主題所使用詞彙類型，以掌握調查文本的語言特色。

表9 主題與詞彙類別統計

類別 \ 主題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身分／職務	3	5	33	10	61	7	119
制度／機關	1	2	17	4	8	3	35
空間	3	15	28	39	40	8	133
時間	2	1	20	9	16	2	50
調查	2	0	13	5	10	2	32
名詞	35	13	55	10	51	7	171
觀念	0	2	9	2	9	0	22
情感	0	0	2	1	12	2	17
設施	0	0	2	3	6	1	12
動詞	5	7	41	15	72	12	152

⁶³ 楊維真：〈商埠、鐵路、文化交流——以近代雲南為中心的探討〉，《輔仁歷史學報》第24期（2009年12月），頁93-115。

⁶⁴ 850個詞彙，根據以下描述對象分類：設施、身分／職務、制度／機關、觀念、時間、空間、調查／統計、情感，非上述詞彙，再依詞性分為：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並新增39個停止詞後，可得811個詞，由於此表內容多，故列於附錄審閱。

類別 \ 主題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形容詞／副詞	7	8	20	4	26	3	68
總計	58	53	240	102	311	47	811

說明：粗體為佔該詞彙類別最多數量的主題

首先就「身分／職務」類詞彙來看，超過半數出現在「邊防」主題（61%），包括具有共同體意涵的呼告：吾、我、吾人、諸君、諸公、人民、子弟、同人、志士等，作為他者的法人、英人、外人、他人、洋人，以及行政官職：領事、總督、官吏、委員、大吏、地方官、土司、總理等，表述邊防事務涉及的身分角色，重視邊境議題上的行動者，強調與他者的分野。

在「制度／機關」拔得頭籌的則是「學務」主題，集中於各式學制，包括舊學制的書院、蒙學，以及新式教育的學堂、小學、學校、師範、大學、中學、女學校、公學等詞。

「空間」類詞彙分布於各主題，卻呈現出不同的描述特色。「邊防」和「國際」主題群大量出現國家名稱，包括日本、中國、支那、法國、安南、英國、緬甸、印度、美國、德國、暹羅、非洲、俄國、世界，顯然是因邊防事關對外事務。這些國家被提及，多半因為與中國的利害衝突，如〈滇緬界事述略〉、〈滇越鐵道之現狀〉、〈法人探險及圖謀雲南之早時期〉等文，均從侵略者的角度來描述英、法等國。「學務」主題出現的地名以城市為主，如上海、太倉、嘉定、杭州、蘇州、湖州、揚州、寧波等，意味著教育資源集中於城市。「物產」和「產業」主題群雖也有城市的高頻詞，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描述方位或地景的詞彙，如東南、鄉間、城內、田中、沿海、馬路等，意即物產及產業調查傾向以更精細的地理位置來描述調查結果。

「時間」類詞彙在「物產」主題的表述很單純，是以每年、近年的概括計數，表現在「國際」主題上則展現出時效性，強調最新狀況

（目下、近來、最近、近今、異日、禮拜）。相較於此，「學務」主題的時間詞彙就很多元，有傳統的干支紀年（壬寅、癸卯、庚子、戊戌、辛丑），亦有新式的點鐘、二十世紀等。

「調查」類詞彙，可觀察不同主題的調查及統計方法。「物產」主題的描述單純（調查、共計），「學務」主題則擁最多相關詞彙，包括總計、列表、數量（若干、多寡、數目、全數、銷數、入款），還有測量、繪圖，應用多種方式。「國際」主題的跨境報告，則以考察、統計、合計、人數、英里，為重點。「邊防」主題大多是長篇調查，而為研究、報告，重視測勘、查勘，以及計算、計之、款項、所得等。

「名詞」類詞彙則可見不同主題的重視項目，「物產」主題的書寫特性高度集中於名詞，達六成，以作物名稱最多（鴉片、棉花、藥材、肥料、大麥、蠶豆等），且多為舊詞。「學務」則使用最多名詞，且多為新詞，用以描述學術科目（地理、國文、體操、法學、物理）以及新文化產物（新聞、雜誌、日報）。「國際」主題描述勢力、法政、外務，「邊防」則涉及層面甚廣，有對外（大局、形勢、條約、範圍、關係），有對內（地方、身家、戶口、民氣、桑梓），有文（政策、思想、知識、法律、輿論），有武（兵力、野心、藩籬），「動詞」在此表現更為突出，擴張、用兵、練兵、駐防、侵略、彈壓、縱橫、保衛、保護。

在各類詞彙中，「設施」、「情感」、「觀念」的共現詞較少，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專有詞彙，共現程度不高而被省略；二是因為調查文本的語言使用性質，較少情感與觀念表露。前者用於解釋「設施」類詞彙，該類有12個共現詞，出現於國際、學務、揭弊等主題，其中以鐵路、交通、工程、機器、火車、工廠等一般性詞彙較多，而像造幣廠、地球儀、下議院等只出現一次的專門設施用詞，缺乏共現連結，故未被納入表中。後者用於解釋「情感」與「觀念」。儘管《浙江潮》和《江蘇》為調查所訂的原則，並未禁止情感的表

露，但由於強調實證精神及客觀數字的表述，調查文本較少使用情感用語。此外，各刊調查重點放在具體事物，而非思想觀念，相關共現詞也比較少。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詞彙集中出現於「邊防」主題，且大多是負面的哀嘆詞，如痛心、慘狀、嗟呼、痛恨、不忍、無恥、傷心、嗚呼、不幸等，這意味著調查結果頗令人失望，也可以說，調查不只用來表述現實狀況，也是作者用來批評現狀的論據。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調查文章使用大量的「新詞」，三份期刊的單篇文章新詞平均使用率高達三成以上。新詞不僅是新事物、新觀念的媒介，它的使用及創造性的誤用本身便反映了文明碰撞時所發生的文化嫁接現象。⁶⁵為解讀新詞使用現象，以下將各主題及詞彙類別的新詞數量獨立列表呈現（表10）。

表10 新詞的主題及類別統計

類別 \ 主題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占比 ⁶⁶
身分／職務	0	3	15	5	21	0	44	37%
制度／機關	0	2	12	2	6	3	25	71%
設施	0	0	2	3	4	1	10	83%
空間	1	3	5	7	6	0	22	17%
時間	1	0	4	3	3	0	11	22%
情感	0	0	1	0	4	0	5	29%
觀念	0	2	9	2	7	0	20	91%
調查	1	0	5	2	3	0	11	34%

⁶⁵ 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4、26-29。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⁶⁶ 占比乃新詞占該類型全部詞彙的比例，分母數為表9的總計欄。

類別 \ 主題	物產	產業	學務	國際	邊防	揭弊	總計	占比
名詞	14	6	34	5	29	2	90	53%
動詞	2	1	17	6	25	4	55	36%
形容詞／副詞	3	2	12	3	12	3	35	51%
總計	22	19	116	38	120	13	328	40%

從新詞使用數量來看，最高的主題群是「邊防」和「學務」，分別是120及116個。⁶⁷從詞彙類別來看，觀念、設施、制度／機關等類使用新詞的比例最高，分別是91%、83%、71%，其中觀念類詞彙共有22個，新詞就占了20個，主要用於「學務」和「邊防」主題（分別為9個和7個）。有趣的是，「學務」主題的新詞多與文明、進步有關（如權利、經濟、政治、科學、維新），「邊防」的新詞則與國家主權有關（如愛國、自治、獨立等）。刊物編輯、作者的革命黨屬性，也在此彰顯，這些激進的新語彙展現革新政治的意圖，這三類詞彙的新詞比例高，正符合學者所言，「外來的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人們需要新的詞語來表述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詞的增長正是這種社會生活變動的反映。」⁶⁸

（二）表格的運用

如前所述，調查文本的寫作風格大致可以分列表型及敘事型。在173篇調查文本中，以「表」為標題者有35篇。事實上，《浙江潮》和《江蘇》在敘例中明確表示，「調查事件應列表者列表」，「務請隨宜備辦，不嫌其費」。⁶⁹該刊如此重視列表，與當時知識潮流有

⁶⁷ 這兩群的新詞使用比例也是最高的，分別是48%和39%。

⁶⁸ 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頁1。

⁶⁹ 〈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頁2。〈浙江同鄉會調查部

關。早在1902年，上海出版的《政藝通報》開闢「政治圖表」和「藝術圖表」專欄，以表格數字披露中國財政狀況（歲出、歲入、外債、關稅等）。1903年，江蘇淮揚海道道員沈瑜慶（1858-1918）鑒於中國素未講求圖表之學，具稟江督於省垣設立圖表局，選擇水陸師學堂畢業生入局，製作地圖及各項圖畫表冊，「遇有交涉，庶不致為外人訕笑，且測量列表等，亦於墾荒大有裨益。」⁷⁰《湖北官報》的編纂科員于漸達（1867-?）更認為「當局者職司其事，亦可按圖索驥，藉此列表，警心觸目，何者當預備，何者當進行，庶政修明，其必自實行列表始乎。」甚至主張圖表比書籍的功用更廣：「書籍……文字精深，必中人以上之資，始能領悟，所以便上等社會者也。圖表則任人觀覽，雖中人以下，亦易寓目，上中下社會無所不宜……而表則隨事登列，尤易領會，似列表更善於圖繪，從事既簡便，而備人觀省，較為易入，無怪乎政界學界，軍界商界，靡不孜孜焉從事於此也。」⁷¹廣東《農工商報》主編江寶珩（筆名俠庵，?-?）則指出，「所謂調查有術者何如乎，其中之祕訣無他，不過先做調查格式紙耳。蓋有一定之格式，即先標出其當查之條件，按格而填，雖中材可以照辦。」⁷²換言之，列表不但被認為是與外國交涉的「文明」工具，也是一種較適於教育一般民眾的知識表述型態，甚至中等資質者，亦可照章辦理。而正因為列表與調查一樣，均有助於施政者興利除弊，也就成為調查的一種書寫範式。

敘例》，《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⁷⁰ 〈各省新聞·請設圖表局〉，《北洋官報》第89期（1903年6月29日），無頁碼。該期原報封面軼失，未能確定出版日期，惟「轅門抄」最晚的條目為「閏五月初四」，第90期最早的「宮門抄」為「閏五月初四」，故推斷第89期的出版日期為「閏五月初五」，轉換陽曆為6月29日。

⁷¹ 于漸達：〈論列表之益〉，《湖北官報》第140冊（1910年9月29日），頁1-2。

⁷² 俠庵：〈實業調查表緒言〉，《農工商報》第27期（1908年3月13日），頁30。

列表型的調查文本主要分為數字與文字兩種表述方式。早在1874年，美籍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翻譯英國當年度的《政治家年鑒》（*The Statesman's Year Book*）一書，以《列國歲計政要》為題出版，後來又在主編的《萬國公報》刊登其他年度的部分內容。1897年，周靈生（?-?）同樣也翻譯了當年度的《政治家年鑒》，以〈丁酉列國歲計政要〉為題，在《知新報》上連載。這些文章提供各國國政的重要政治、社會、經濟統計，具體地呈現各國國勢優劣。⁷³換言之，19世紀末關注世界大勢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數字政治」的想法並不陌生。

用數字闡述事實最大的好處是有比較的基礎，正如梁啟超所言：「區以國別，分類畢載，冠以總表，藉相比較，國與國比較，而強弱見。年與年比較，而進退見，事與事比較，而緩急輕重見。」⁷⁴《浙江潮》曾刊出〈各省人口現在數〉一文，此乃根據戶部的調查資料，比較各省及內外蒙古、滿洲、西藏、土耳其斯坦的人口數字。文章對於數字沒有任何解釋，但排版時特別在浙江一欄作記號（見圖5），顯然提醒讀者注意該欄數字。令人意外的是，表中所列浙江人口為11,580,692，在18行省中，排名14，僅勝於甘肅、陝西、貴州、廣西，這顯示浙江省在全國人口比較中居於相對弱勢。⁷⁵

另一種列表方式是將文字訊息以表格呈現，其最大的特色是將訊息編入預先設定的類別，形成「標準化」、「欄位化」的知識。例如《浙江潮》刊登許多教育相關的調查資料，包括學校名稱、課目、教習名單、幹事名單、學生人數、經費、設立年月等項目（參見圖6），大致上符合該刊所提供的寫作指引（參見表2）。和數字表格一

⁷³ 車泰根：〈數：帝國的算數與近代世界〉，《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輯（2014年12月），頁241。

⁷⁴ 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時務報》第33冊（1897年7月20日），無頁碼。

⁷⁵ 〈各省人口現在數〉，《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頁102-103。

樣，這種欄位化的訊息易於比較優劣，不過這也是「去脈絡」的知識形式。以圖6為例，所有關於學校的訊息只能呈現某些表面事實，卻無法了解學校運作情況；同時由於缺乏地域文化的觀照，只能以單一標準衡量各校的辦學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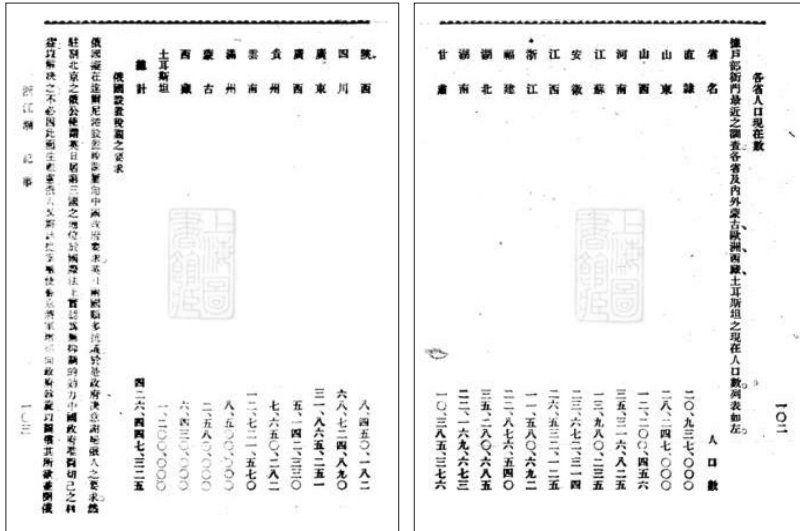


圖5 《浙江潮》的數字表格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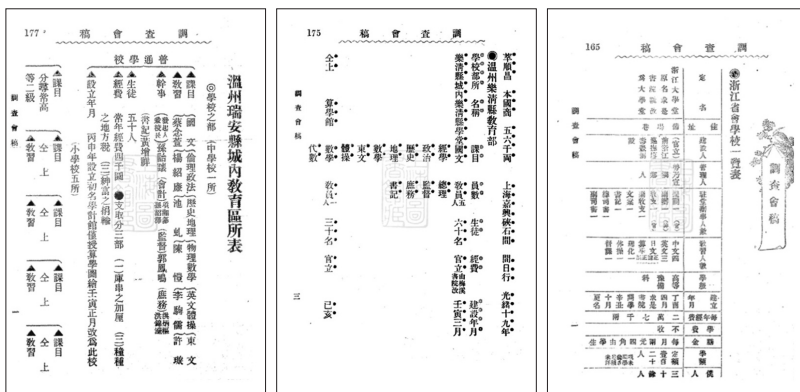


圖6 《浙江潮》的文字表格版式

（三）方志的影響

儘管留日學生試圖把調查定位為新的文類，細察各刊調查專欄內容後則發現，清末調查的內容並不那麼「新」，其中《浙江潮》和《江蘇》常出現的地方物產表就明顯有傳統志書的痕跡。例如〈處州青田縣調查稿〉及〈嘉興平湖縣物產表〉，分別抄自光緒元年（1875）的《青田縣志》及光緒十二年（1886）的《平湖縣志》，尤其是風俗和物產的描述，與方志幾乎如出一轍。⁷⁶有趣的是，不同於傳統方志的直書，期刊傾向以列表方式來呈現物產內容，試圖以新的排版形式來包裝既有的知識。⁷⁷從印刷技術層面而言，此乃緣於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的石印法，使期刊版式更具彈性，表格排版也較為容易。⁷⁸從閱讀經驗的角度來說，直書呈現「連續性」的物產清單，表格則呈現「切割」的視覺效果，使每種物產獲得均等的版面地位及讀者的注意。

除了版式，事實上物產調查表的內容也有別於方志之處。晚清農學教育的興起，栽培一批知識分子，為地方物產調查效力。《浙江潮》第4期刊登的〈紹興新昌縣物產表〉，作者陳拜庚（?-?）自杭州蠶學館畢業之後，與同學俞鴻荃（?-?）和吳錫璋（?-?）一同被派往紹興府設置蠶學會，擔任教習。⁷⁹這篇物產表可以說是他在紹興新昌縣的觀察所得。不過他也坦承，「除烟繭茶朮四項外，均難確實調查」，顯然表中尚有其他資料來源，尤其是只記物產（種）名稱而無任何說明者。至於他親自調查的項目，多能舉出市場行情，補充最

⁷⁶ 李志英曾針對這兩篇與方志的差異作文字對照，參閱李志英：〈古代方志與近代社會調查之淵源關係探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2013年6月），頁39-41。

⁷⁷ 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4期（2019年12月），頁78。

⁷⁸ 吳方正：〈晚清四十年上海視覺文化的幾個面向〉，《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6期（2002年12月），頁49-95。

⁷⁹ 羅振玉：〈浙江各府縣勸設養蠶公會記〉，《農學報》第134期（1901年3月），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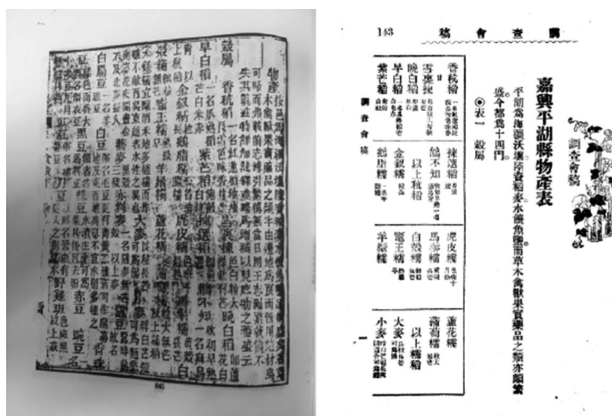


圖7 《浙江潮》與《平湖縣志》所錄的平湖縣物產⁸⁰

新資料。如「烟葉」條下註：「有紅黃白三色、尖圓二種，出西境豐樂鄉一帶者佳。新烟上市，客幫麪集，銷於杭嘉湖為上，寧紹次之，台溫次之，去年亦有出洋者，每歲所入約百餘萬。」不但詳細描述物產本身，也說明市場區隔狀況，而「去年」、「百餘萬」等語更是作者以具體的時間及數字來陳述調查結果的例證。⁸¹

又如《江蘇》第4-5期刊登的長文〈武陽土產表〉，作者顧祖武（?-?），常州人，熱心地方教育，曾因府內各縣學務腐敗，與武進、陽湖等縣士紳共同倡議設立常州府學務公所，後來又擔任武陽公學校長，人稱「教授勤懇而辦事才具」。⁸²顧氏所著〈武陽土產表〉與光緒五年（1879）出版的《武進陽湖合志》差異很大：方志所記土產分為穀、蔬、瓜、果、花、草、藥、禽、獸、鱗、介、飲食、服用

⁸⁰ 左圖：彭潤章、葉廉鏐修纂：《平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光緒十二年〔1886〕刊本），頁34。右圖：〈嘉興平湖縣物產表〉，《浙江潮》第9期（1903年11月28日〔癸卯九月二十日〕），頁143。

⁸¹ 陳拜庚：〈紹興新昌縣物產表〉，《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頁171。

⁸² 〈常州府許太守稟設學務公所〉，《申報》第9版，1906年3月13日。〈續江蘇總學會復蘇學務處函〉，《申報》第2版，1906年8月29日。

等13屬共62種物產，名稱之下的註釋通常較為簡短，主要記載產地和形狀，如「西瓜產武進安西鄉奔牛者佳」、「荷產陽湖新塘鄉芙蓉湖最盛」、「鰕虎產陽湖大窰鄉石堰白洋，色白口闊頭方四腮」。⁸³

〈武陽土產表〉分為農圃、樹藝、畜牧、製造四大綱目，其下又各分為五類，計有稻、麥、菽、蔬、雜植、林材、果品、水產植物、花卉、藥材、羽族、毛族、鱗族、介族、昆蟲、食品、服用、雜貨、礦物、農漁具等20類868種物產，包括農林漁牧礦的第一產業原物料，和食衣住行日常生活所需的第二產業製造品。物產名稱之下的註釋，除了別名、種類、形狀、特性、功用外，還會附上個人考察所得的「新知識」。如「向日葵」條下註「即古之葵，聞化學家言云，多種可避疫，子搾油作乳哺嬰，尤勝牛乳，稽葉燒灰可為肥皂，再用化學提煉，其稽能抽絲，比於蠶絲。」也會注意地方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於物產的影響，如「牛轉翻車」條下註「俗名水車……往時人少栽稻，水欠收歉，於食已足，故有翻車即可。近時人多栽稻，水富收豐，猶不足食，有斯民之任者，於水車一項，盡力持之。余幼時所見水車極少，邇來舉目皆是，具見農夫改良之特性。惟旋作旋輟，不知相友相助耳。」⁸⁴從這些註文可以看出，〈武陽土產表〉資料詳盡的程度遠超過《光緒武進陽湖合志》，且包含許多個人即時性的觀察與經驗。

地方志對晚清調查的另一個影響是地圖。地方志附刊輿圖有相當長的傳統，前述的《光緒武進陽湖合志》在卷首便刊有輿地圖56幅及營建圖13幅，並宣稱：「志之作也，必有圖以翼之。蓋志者，識其始末興廢，而其繁賾錯綜，逶迤繚繞，非圖燦陳不能曲盡。」⁸⁵《浙

⁸³ 董似穀、湯成烈修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重印，1968年），卷2，頁42-44。

⁸⁴ 顧祖武：〈武陽土產表〉，《江蘇》第4期（1903年6月25日），頁147-171；〈武陽土產表（續）〉，《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頁136-149。引文出自〈武陽土產表〉，頁149-150；〈武陽土產表（續）〉，頁144。

⁸⁵ 董似穀、湯成烈修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首諸圖、頁1。

江潮》自發行之初，即設置「浙江全省十一府新地圖」系列，意在使讀者對該省地理有具體的印象。該刊原計畫刊登同鄉會調查員自行繪製的浙江省全圖，然創刊號倉促付印，未能及時完成，因而「以舊本充數」。⁸⁶該刊售罄重印時，以其「係屬舊本，廢棄不用，俟十一府新地圖及沿海港灣新地圖逐期刊畢，全省總圖再行刊登。」⁸⁷惟《浙江潮》只出版12期便告停刊，因此該刊只登了分府地圖10張及沿海港灣圖3張，原本預定由調查員自行繪製的處州府圖及浙江省圖並未面世。⁸⁸儘管該刊再三強調這些地圖乃「同鄉會會員自行繪畫」，「與坊間售本，精粗相去霄壤」，⁸⁹但這些地圖並非憑空想像而來，筆者推測乃以光緒二十年（1894）的《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為底本。1890年清會典館以舊會典「有府圖而無縣圖，亦不計里開方」，下令各省繪製開方圖。同年，浙江輿圖局成立，由宗源瀚（1834-1897）任總辦，針對該省78廳縣進行實地測量，動用人力百餘名，歷時三年多，累積圖稿三千餘紙，底冊近千本，於1894年由杭州武林印書館出版《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石印本，全書共20大冊。⁹⁰比對《浙江潮》的「浙江全省十一府新地圖」和《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的分府地圖，可以發現兩個共同點：一是府圖的排列順序一致，二是一字不差的分府地圖圖說，因此，《浙江潮》的

⁸⁶ 〈本會雜誌部緊要廣告〉，《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無頁碼。

⁸⁷ 〈本會雜誌部緊要廣告〉，《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無頁碼。

⁸⁸ 《浙江潮》所刊地圖有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各府地圖，以及杭州灣、乍浦口、寧波灣港灣圖。根據《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浙江潮》共出版12期，其中11與12期合刊，因此只刊載了10篇分府地圖。但《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僅收錄至第10期，因此筆者未能寓目溫州府圖，又由於筆者所見的《浙江潮》版本係屬再版，因此也未能見到該刊最早刊登的「浙江省舊本地圖」。

⁸⁹ 〈本會雜誌部緊要廣告〉，《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⁹⁰ 輿圖總局編繪：《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光緒二十年〔1894〕石印本）。裘沖曼：〈浙江省測繪地圖述略〉，《浙江檔案》1992年第2期（1992年2月），頁40-41。原文藏於浙江省嵊縣檔案館，作者裘沖曼（1890-1972）於1912年起任職於浙江省測量局。

新地圖很可能是建立在9年前所出版《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的基礎之上。不過《浙江潮》所宣稱的「新地圖」也非全為虛言。圖8對照《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和《浙江潮》版本的杭州府地圖，前者較為詳細，標示的地點和資訊較多，測繪單位每方格20里。後者測繪單位每方格50里，資訊較為簡略，但每張圖獨立列出凡例及指南針方向，山脈標示也不再以傳統方志的側面形，改採俯視形（圖9）。⁹¹1873年，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和趙元益（1840-1902）合譯連提（Auguste Frédéric Lendy，1826-1889）的《行軍測繪》（*A Practi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Topographical Drawing*），介紹「平剖面線」（即等高線）的概念，「令人看圖即能知各物之高低，此用粗細鬆密之線，以為記號。」⁹²此即《浙江潮》的山脈畫法。可以說，從形制來看，《浙江潮》的「新地圖」更接近現代地圖的呈現方式，而該刊強調這套新地圖的繪製者是「浙江同鄉會調查員」，也把地圖置入「社會調查」的範疇內。

⁹¹ 《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曾於1915年出修訂版，根據〈修訂凡例〉，民國以後，浙江省改制為4道75縣，故依新制刪訂，但保留舊府圖11幅。該凡例亦稱舊府圖的山脈為「側面形」，「近不適用」，新繪各縣地圖的山脈改採陸軍測量局的「俯視形」，即等高線的畫法。宗源翰等原纂修，徐則恂等修訂：《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第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民國四年〔1915〕石印本）。

⁹² 連提撰，傅蘭雅、趙元益譯：《行軍測繪》（出版地不詳：製造局編譯股，1873年），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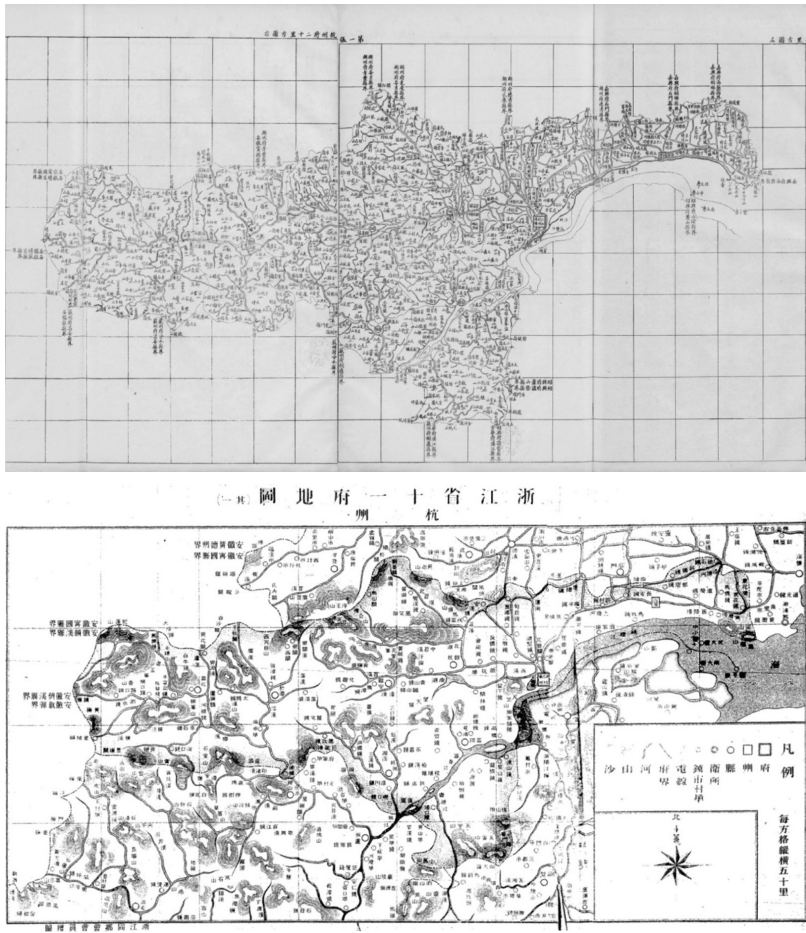


圖8 杭州府地圖⁹³

⁹³ 上圖：〈舊杭州府廿里方圖〉，收於輿圖總局編繪：《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光緒二十年〔1894〕石印本），無頁碼。下圖：〈浙江省十一府地圖（其一）杭州〉，《浙江潮》第2期，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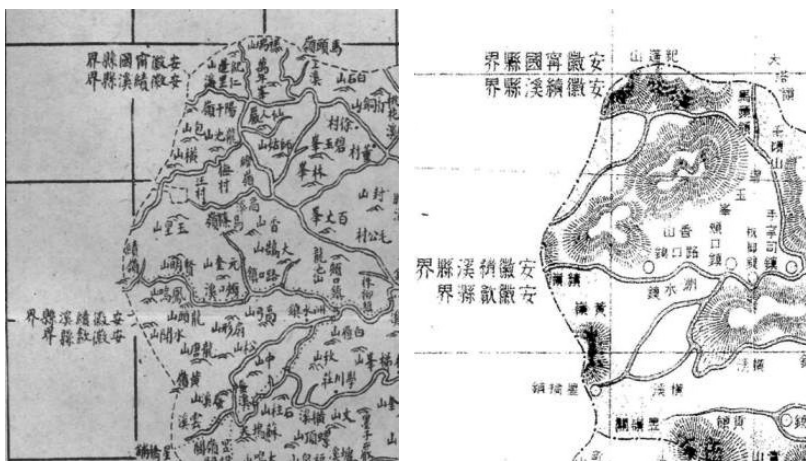


圖9 杭州府地圖（局部）⁹⁴

五、結論

晚清留日學生對於調查的熱衷與推動，可說是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先驅，甚至早於社會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儘管他們不一定具備社會學專長，甚至不見得學過社會調查，但他們的努力造就了第一波的社會調查運動，具體成果表現在五方面：鼓吹社會調查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在同鄉會裡設調查部；在期刊中設置專欄，出版調查報告；界定調查及其方法；設定調查議題——後三者均意圖把調查提升至具有特定寫作類型的高度。

這些努力有效嗎？從調查欄目的實際操作來看，這些邊界並不完全能有效地區別出「調查」的實質：許多調查文章仍貌似新聞、政論、歷史的混合體，尤其調查性質的文章經常出現在「雜錄」之類的欄目，可見調查文章尚屬「雜文」之流，還未能取得如「社論」、「文學」等明確的文類身分。不過如果我們把這些努力看成製作新文

⁹⁴ 資料來源：同圖8。

類的過程，社會調查文類的確在成形中，至少《浙江潮》的「調查會稿」欄目有較為清楚的界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調查文章所呈現的語言特徵，包括詞彙類型、日語新詞和非文字的表達。為了解晚清調查的主題與書寫風格，本文利用數位工具進行詞彙分群，同時以人工方式為詞彙分類，藉由群與類的交叉比對，定出調查主題，並觀察各主題所偏好的詞彙類型。這種「遠讀」（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為晚清社會調查畫出較為清晰的輪廓：過去的相關研究，不是精細地分析特定的調查文本，就是只能對大量的調查文本進行簡單的描述統計分析，本文希望可以在兩者之外另闢蹊徑，本文針對《浙江潮》、《江蘇》、《雲南》三份期刊所作的文本探勘，分析主題與詞彙。相較於過去只能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極為寬泛的框架標籤，本文根據共現詞網絡運算，藉由機器區分出六個主題群，再藉由人工的詞彙分類，以更深入解讀詞彙使用特性，並將主題詞彙扣合該期刊／地方的脈絡，解析調查與各地具體情境的關連。此外，藉由詞彙分析也發現日語新詞在調查文章中的廣泛應用，幾乎出現於所有主題和類型的詞彙。本文借用文字探勘的方法，計算出單篇調查文章的新詞平均使用率達三成，換言之，沒有日語新詞，幾乎很難表達調查的結果。

最後要回應晚清史的老問題：調查可算是「新」文類嗎？從《浙江潮》和《江蘇》的例子可以看出，調查這種文類在發展過程中，方志提供許多養分，甚至有些調查的內容直接採自方志，看起來像是「新瓶裝舊酒」。不過這兩份刊物均強調一種新的知識表達方式，尤其是表格與數字的使用。倡議者認為，表格與數字有助於「比較」，也就是要區分高下優劣；要能知己知彼，才能興利除弊。地圖的繪製同樣也結合了傳統方志和新的測繪技術。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晚清社會調查的新軌跡。

徵引書目

報刊

- 〈八月十二日京報全錄〉，《申報》第4版，1872年10月1日。
- 〈女學調查部專約〉，《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
- 〈中國醫藥學會簡章〉，《醫藥學報》第1期，1907年2月13日。
- 〈本社重要廣告〉，《四川》第1期，1908年1月。
- 〈本會雜誌部緊要廣告〉，《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
- 〈本會雜誌部緊要廣告〉，《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
- 〈各省人口現在數〉，《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
- 〈各省新聞·請設圖表局〉，《北洋官報》第89期，1903年6月29日。
- 〈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江蘇》第1期，1903年4月27日。
- 〈法政學交通社章程〉，《法政學交通社雜誌》第1期，1907年1月。
- 〈紀實界：海濱公會總則〉，《蘇報》第2508號，1903年7月2日。
- 〈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
- 〈浙江省十一府地圖（其一）杭州〉，《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
- 〈專件：新無錫會〉，《童子世界》第33期，1903年6月16日。
- 〈常州府許太守稟設學務公所〉，《申報》第9版，1906年3月13日。
- 〈處金衢嚴四府調查會之緣起（附辦法體例）〉，《萃新報》第2期，1904年7月11日。
- 〈訪事員規則及要目〉，《江西》第1期，1908年7月9日。
- 〈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29日。
- 〈嘉興平湖縣物產表〉，《浙江潮》第9期，1903年11月28日。
- 〈調查部徵事特別廣告〉，《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
- 〈續江蘇總學會復蘇學務處函〉，《申報》第2版，1906年8月29日。

- 于漸遠：〈論列表之益〉，《湖北官報》第140冊，1910年9月29日。
- 李景漢：〈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第1期，1927年6月。
- 俠庵：〈實業調查表緒言〉，《農工商報》第27期，1908年3月13日。
- 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時務報》第33冊，1897年7月20日。
- 陳拜庚：〈紹興新昌縣物產表〉，《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
- 步濟時（John Stewart Burgess）：〈「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期第4版，1919年11月1日。
- 羅振玉：〈浙江各府縣勸設養蠶公會記〉，《農學報》第134期，1901年3月。
- 顧祖武：〈武陽土產表〉，《江蘇》第4期，1903年6月25日。
- 顧祖武：〈武陽土產表（續）〉，《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

專書

-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
- 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朱京偉：《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軌跡》，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
- 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 呂文濤：《語文接觸視閥下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 李良榮：《中國報紙文體發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1年。
- 沈國威：《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 宗源翰等原纂修，徐則恂等修訂：《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第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民國四年（1915）石印本。
-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江蘇藝文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馬小泉：《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連提（Auguste Frédéric Lendy，1826-1889）撰，傅蘭雅、趙元益譯：《行軍測繪》，出版地不詳：製造局編譯股，1873年。
- 彭潤章、葉廉鏗修纂：《平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光緒十二年（1886）刊本。
- 黃河清：《近現代漢語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董似穀、湯成烈修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重印，1968年。
-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檔案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福建省委員會編：《辛亥革命福建英傑圖志》，福州：海峽書局，2011年。
- 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輿圖總局編繪：《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光緒二十年（1894）石印本。
- Biber, Douglas.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u,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論文

-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2003年，頁181-194。
- 朱京偉：〈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時間溯源——以《申報》和其他5種清末報刊為例〉，《日語學習與研究》2020年第4期，2020年8月，頁1-10。
- 牟永如、許小青：〈社會調查真開始於民國嗎？——以清末社會調查為中心探討〉，《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2008年4月，頁93-96。
- 吳方正：〈晚清四十年上海視覺文化的幾個面向〉，《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6期，2002年12月，頁49-95。
- 李志英：〈古代方志與近代社會調查之淵源關係探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2013年6月，頁37-46。
- 李根源：〈序〉，收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頁1-5。
- 李錫貴：〈黃展雲在光復前的革命活動〉，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27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20-123。
- 沈懷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頁159-182。
- 車泰根：〈數：帝國的算數與近代世界〉，《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輯，2014年12月，頁237-251。
- 孫濤：〈中國早期留日學生的社會調查實踐〉，《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2004年8月，頁29-32。

秦毓鑾：〈天徒自述〉，《近代史資料》第111號，2005年7月，頁140-151。

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4期，2019年12月，頁69-128。

陶孟和：〈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收於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卷2，頁101-121。

楊維真：〈商埠、鐵路、文化交流——以近代雲南為中心的探討〉，《輔仁歷史學報》第24期，2009年12月，頁93-115。

裘沖曼：〈浙江省測繪地圖述略〉，《浙江檔案》1992年第2期，1992年2月，頁40-41。

劉訓華：〈近代留日學生的革命性——對《浙江潮》編輯群的歷史考察〉，《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頁125-129。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頁105-139。

Burgess, John Stewart. "A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in Chinatown, New York, as Shown by Their Use of Leisure Time." M. 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09.

Giltrow, Janet, and Dieter Stein. "Genres in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Genre Theory." In *Genres in the Internet: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Genre*, edited by Janet Giltrow and Dieter Stein, 1-2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Miller, Carolyn R. "Genre as Social A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0, no. 2 (May 1984): 151-167.

網路資料

上海圖書館編：《全國報刊索引·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網址：

<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1年6月24日，2022年8月1日。

漢語新詞資料庫，網址：<http://140.109.240.65:8080/japan/index.php>，
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4日。

斷詞系統Ckip Tagger，網址：<https://ckip.iis.sinica.edu.tw/service/ckiptagger/>，
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4日。

Find a Grave. “Memorial page for John Stewart Burgess (12 Jul 1883-16 Aug 1949).” Accessed May 26, 2021. www.findagrave.com/memorial/100284501/john-stewart-burgess.

附錄

分群	身分／職務	制度／機關	空間	時間	形容詞／副詞	調查	動詞	名詞	觀念	設施	情感
物產	農家、出者、土人	公所	地面、府縣、田中	每年、近年	以下、不宜、有名、黑白、相同、黃白、天然	調查、共計	從事、輸出、盛行、叢生、俗呼	鴉片、物產、性質、價值、土產、棉花、俗名、生計、藥材、智識、礦物、肥料、私囊、大麥、蠶豆、風俗、種類、公費、植物、苦竹、賽會、雞蛋、麻雀、小麥、南瓜、冬瓜、白菜、絲瓜、蘿蔔、百合、薄荷、菖蒲、菜油、枇杷、豆腐			
產業	紳士、經理、外國人、水師、人家	總會、洋行	杭州、城內、東西、東南、本地、沿海、鄉間、四方、航路、湖州、臨安、馬路、城中、大東、嘉興	同治	重要、官立、無知、互相、居多、價昂、日甚、不佳		利用、監督、成立、獲利、辦事、開採、搬運	經費、資本、礦產、事業、貨物、觀音、文學、來者、地勢、存款、木偶、居心、利息	公益、權力		
學務	學生、教習、同胞、陸軍、國民、師範、丁督、西人、教民、婦女、大人、警察、同志、兄弟、教員、吾國、耶穌、青年、地丁、幹事、無賴、教士	學堂、小學、學校、書院、師範、社會、組織、官場、大學、中學、教堂、蒙學、機關、女學校、中學校、公學、會社	上海、西南、越南、蘇州、各國、東北、西鄉、中外、西門、西北、南門、太倉、中原、湘、一國、城東、東門、中西、嘉定、山頂、大街	一日、去歲、歷史、現在、壬寅、每日、去年、庚子、終日、癸卯、常年、辛丑、即將、點鐘、二十世紀、現時、平年、戊	腐敗、各種、其一、普通、內外、在內、發達、特別、完全、非常、私立、困難、不善、咄咄、不同、嚴密、日見、有用、高下	若干、多寡、列表、公款、測量、總計、會計、數目、全數、繪圖、銷數、稽察、入款	出入、往來、注意、舉動、提倡、演說、設有、中止、留學、建設、代表、游學、管理、創設、出產、公認、推廣、勒令、速成、上堂、發財	地理、名目、利益、國文、現象、英文、實業、團體、體操、程度、精神、合同、蠶桑、洋貨、薪水、書報、宗旨、新聞、義務、風氣、雜誌、洋紗、普通學、學費、意見、基礎、工藝、詞訟、學問、庶務、規模、稻田、課目、倫理、法學、事宜、巨款、能力、農	權利、經濟、進步、文明、主義、利權、政治、科學、維新	器具、工廠	無恥、幸福

分群	身分／職務	制度／機關	空間	時間	形容詞／副詞	調查	動詞	名詞	觀念	設施	情感
學務	發起人、主人翁、通事、每人、聯隊、士官、小民、小人、鄉人、砲兵、書記、步兵		雲貴、祖國、大陸、城外、要衝、寧波、東鄉				卒業、自立、出於、出售、振興、出資、沸騰、衝突、歸國、販賣、需用、預備、通行、掌握、為奸、發起、淘汰、充當、養成、開設	學、資格、體內、容、民生、農、業、日報、姓氏、花生、物算術、東文、圖畫			
國際	記者、公使、日本人、子孫、商人、留學生、御史、俄人、論者	章程、軍事、海關、學校	雲南、日本、浙、法國、東京、蒙古、四川、廣西、本國、北京、世界、附近、外國、廣東、山西、山東、貴州、湖北、江蘇、那、福建、直隸、安徽、湖南、俄國、此地、南、羅、天津、西、京、國、洋、置、洲、國、中、山	近來、最近、異日、他日、日期、西曆、目下、禮拜、近今	確實、著名、緊要、無數	人數、統計、合計、考察、英里	不勝、干涉、出口、武備、蔓延、游歷、進行、出現、起程、敷設、到任、成功、探礦、探掘、運送	勢力、人口、法政、大利、路線、金銀、來函、雜貨、外務、牛皮	教育、自由	工程、機器	奈何

分群	身分／職務	制度／機關	空間	時間	形容詞／副詞	調查	動詞	名詞	觀念	設施	情感
邊防	吾、我、英人、外人、民、諸君、事、督、吏、同委、士、弟、民、人、洋人、大吏、同鄉、地方官、土司、總理、吾人、會員、學者、商人、父老、兵士、工人、官兵、越人、死者、邑人、現任、漢人、督撫、巡撫、海軍、劣紳、	政府、公司、衙門、總辦、外交、本部、銀行、政界	滇、中、國、南、地、越、城、甸、度、縣、間、理、在、國、戶、南、永、迤、騰、省、垣、兩、國、以、南、關、道、黔、東、海、鹽、勝、地、四、面、野、人、山、江、北、外、省、交、趾、緬、界	今日、將來、光緒、以前、一時、同時、今年、日夜、當時、明年、目前、時代、即日、現時	不堪、高等、極力、尋常、不便、直接、對於、多數、頑固、如故、彼此、任意、詳細、不合、便利、媚外、陸續、黑色、關於、不利、寥寥、必要、大肆、危險、無用、有益	研究、報告、所得、平均、計算、測勘、計之、查勘、款項、歸於	保護、辦理、開辦、交涉、經營、改良、亡國、設法、實行、過問、抵制、管帶、竭力、公舉、進兵、聯絡、影響、要求、奔走、前往、通商、輸入、布置、存亡、失敗、會同、擴張、整頓、承認、禁止、開會、開通、可望、用兵、回國、力爭、練兵、入境、告成、有志、駐防、占領、商議、保衛、彈壓、比較、舉辦、督辦、失去、準備、營業、縱橫、警告、照會、喪失、經過、平定、維持、生存、	地方、目的、關係、問題、原因、手段、生活、商務、商業、前途、土地、辦法、責任、大局、條約、形勢、野心、事件、結果、姓名、消息、工商、會議、全體、範圍、本任、桑梓、利害、身家、漢文、識錢、戶口、法律、是非	國家、愛國、開化、自治、主權、新政、衛生、獨立、和平	鐵路、交通、鐵道、海防、軍械、軍火	嗚呼、熱心、慘狀、傷心、嗟乎、不忍、痛心、同情、痛恨、希望、不幸、甘心

分群	身分／職務	制度／機關	空間	時間	形容詞／副詞	調查	動詞	名詞	觀念	設施	情感
邊防	職員、識者、蠻允、先生、主人、某君、新軍、土民、紳商、飢民、華人、商民、警兵、著者、路工、大員、諸公、敗類、當道、個人						要素、自辦、出洋、有心、賄賂、搶劫、合辦、收回、作僱、出版、殆盡、侵略、挽回				
揭弊	婦人、知府、人人、女子、法兵、紳富、駐兵	學界、女學、本社	交界、南北、河口、以東、河內、橋頭、九龍、區域	近日、年間	野蠻、實在、黑暗	兵數、實數	設立、運動、製造、駐紮、興學、附屬、派兵、主張、電告、反對、逢迎、風聞	情形、道路、事務、方法、動物、人物、死亡		火車	噫、感激

說明：各欄詞彙依出現篇數排序，粗體為日語借詞（新詞）